觀察

第三卷 第廿三期

專論

關於中國出路的看法 張東蓀

雄聖甘地 費孝通

論習文史 陳夢家

華盛頓通信

美國和平中的火藥味 楊慶堃

外論選譯

解放區印象記 一個聯總工作者

觀察通信

關內外的烽火（觀察通信）觀察記者

衛立煌出長東北剿匪總部與全盤戰略的新部署（南京通信）觀察讀者投寄

西北局勢報告（蘭州通信）特約記者

廣東不靖，交通癱瘓（廣州通信）觀察讀者投寄

週末闢欄

幹部之累 田汝康

文藝

精工與草率 徐中玉

讀者投書

「九龍事件」在北平 北平日報來函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呂復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宗白華 胡適 柳無忌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德珩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傅雷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雷海宗 趙超構 蔡維藩 樓邦彥 錢清廉 錢端升 鉦覺民 戴世光 韓德培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何永佶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周東郊 季羨林 胡先驌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韋新以 馮友蘭 曾昭掄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楩 葉公超 趙家璧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歌川 錢鍾書 戴文葆 戴鎦齡 蕭乾 顧翊羣

讀者投書

「九龍事件」在北平

編者先生：本月六七日，九龍事件在北平成爲頭條新聞，大小報紙都撰論呼籲收回港九，平津冀三參議會也通電抗議港警暴行，學生中間也有過罷課的消息，情緒高漲，彷彿一個風暴就要到來似的。但事至今日，一切都成過去，報紙上只偶爾看到一點見九龍的消息，學生們也不會有什麼行動了。看看廣州等地熱烈的遊行，古城顯得太冷靜了。是不是這裏的人民不愛國？不關心同胞的生命？是一個値得探究的問題。

首先令人費解的是：爲什麼九龍的消息要由中央社獨家發佈？九龍事件，並不自今日始，爲什麼這個時候政府才特別重視？這幾年來，僑胞在國內，國外受壓迫與凌辱的眞不知有多少，欺侮中國人的也不只英國人？爲什麼中央社不詳細報導？：：這許多不能解答的問題，就造成了九龍事件的複雜性。因此，許多關心國事的人這時都閉口不談了。清華的吳晗教授等對訪問的學生，都以「眞象不明」爲詞，採取保留態度，張奚若教授甚至說：「不要上人家的當。」北大胡適校長也婉言拒絕談這問題。北平學生的遲遲不採取行動也造因於此。

不過，學生們終久不會袖手旁觀，坐視不理的。鐵院，朝院都曾拍電抗議港警暴行，近北大又建議華北學聯宣言反對英帝國主義。但，他們的行動是持重的，對於整個事件的發展，他們有過冷靜的分析。北大的南北，夜星，黃河，風雨等壁報都曾表示意見。據他們看：政府不會採取強硬的手段對付英帝國主義者。政府之採有反英行動，在政治上，是因爲香港成爲民主人士的避難地；在經濟上，是因爲華南成爲英美商業的角逐所，美國人要「復興華南」，自然不容許有第二國跟他競爭，於是宋子文主粵，於是有中港協定，於是九龍事件擴大；再，政學系與CC的衝突，政府之企圖分散人民的視綫，造成一種盲目的仇外心理，也是重要的原因。但政府并沒有決心跟英國人下不去，因此事件擴大到相當的程度時，態度又軟弱了。……

聽聽學生們的意見，再讀讀各報的社論，覺得學生們說得也還不錯。經世日報是極力主張收回港九的，根據一月十六日「三論港九問題」一文，知其所持理由，一爲經濟方面的，「例如香港當局企圖香港的繁榮，不惜操縱投機，致黃金美鈔黑市的開價，上海仰香港鼻息，國內其他各地再依上海黑市的昇降而昇降。隱隱然，香港成爲中國金融市場黃金美鈔黑市的發源地。香港政府更縱容走私，我政府禁止輸入的物品，可從香港偸運進來。」一爲政治方面的，也是骨子裏的一大苦痛，「二年多以來，香港當局在各方面，還是抱着抗戰以前的那套老帝國主義的辦法，來對付我們，所以港九不僅成爲破壞吾政府金融管制，貿易管制的大本營，更成爲叛逆份子的收容所以及策源地。」

世界日報向被稱爲CC的報紙，在叢篇抗議九龍事件的社論中，言詞激昂，但重心却側重於對外交當局的攻擊，「至少如果政府當局早提抗議，全國人民亦必將爲援助政府表示其嚴正的態度，我們不相信英國政府不會重新考慮一下，不見得會要爲此彈丸之地與人民爲敵而無所顧忌。可是政府並沒有這樣做，所謂『尋求友好方式解決』的結果，是人家拿着槍逼着我們搬家。如果那二千多同胞因不甘屈服而流血犧牲，不知負責當局何以自解？何以對得住這些應該受保護的人民。」「總之，此次事件演變至今天這樣的情形，固然是由於香港政府若干年處心積慮的陰謀的結果，同時也顯然是由於我們外交當局之未能及早採取有效的措施，以致因循貽誤。因此，我們主張：一方面應該從速支援九龍城同胞反抗暴力的行動，而對外交負責人員辦理不善，也應該予以懲戒撤換的處分。」話是說得響亮的，但外交部不是還有人負其全責嗎？避開這個不談，單攻擊「依題作文」的外交人員，不也令人難解嗎？

華北日報維持了其一向的作風，每有一次運動，就得痛罵一次「共匪」。九龍事件發展至高潮時，它也很重視學生的行動，凡有提出抗議的，便給以「願堅決支持政府」的小標題。沙面事件發生後，又高呼防止「共匪」進行類似的行動，其對沙面事件的評論是這樣的：

「爲什麼奸徒們要在此時發動義和團式的暴行呢？那眞是爲了九龍城的主權，九龍城居民的利益嗎？不是的，他們的行動只有使我外交當局於進行主權的交涉時，發生意外的周折與困難，只有使我九龍城居民更受到香港當局的嫉視與迫害。他們此時要排外，特別是要反英反美，完全是爲了要轉變國人的視線，分散國人的注意力，使國人不再注視他們自己在東北所進行的那類出賣民族利益，斷送領土主權的勾當，並使國人發生一種錯誤的幻覺，以爲中國當前的民族危機，還是在南方而不在東北或西北。這與當初日寇在我國宣傳反英反美是同樣的動機與作法，今日的奸徒們，自然是反美之心更切於反英。可是，現在找不到美國有什麼損害於我國的行動，剛好此時九龍城事件發生，他們就先從反英入手，希望使事件愈益擴大，擴大到不可收拾，一面使政府捲入不必要的對外糾紛，一面將運動發展爲一般性的排外。他們要藉口反帝國主義的動人口號，掀起反英美的狂潮，以便他自己在這紛亂之中，偷偷進行其建立第二滿洲僞國的陰謀。」

這眞是個複雜萬分的時代，同胞受了壓迫，國人們還在大做其反共文章。「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現在，九龍事件日趨沉寂，同胞的血白流了！這該是誰的罪過？這該是誰的罪過？

以上算是對九龍事件在北平反響的一點報導。

曾乾　一月廿三日　北平

北平日報來函

編者先生：貴刊三卷二十一期所載「歲尾年頭戰局總分析」一文內，第十四頁第三欄有如下一段記事：『二十八日平某報上的標題是「北平成孤島，鐵路寸寸斷。」剿總派員訪問了該報以後，到三十日又刊出了「條條鐵路通北平」的頭條新聞。』文中的某報，按卽指敝報而言。該項標題迭見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九及三十日的敝報，這係事實。但需要特別辯正的，剿總並不曾派員到敝報訪問過，不但在那個時候沒有，就是到現在爲止，根本沒有見到過總派任何人員來到敝報。

我們還願意提及一點：平綏線二十七日被劇烈切斷的消息，敝報於二十八日卽已刊載，當日情形顯得更惡化，平綏，平保，平津，平古四大幹線發生問題，所以二十九日的報上現出前一個標題。我們的記者曾經冒險隨搶修列車赴淸河前線觀察，獲知搶修的詳情，剿總於二十九日的下午舉行記者招待會，特就各路通車情形提出報告，并強調「北平成孤島」的形勢業成過去，語意當有所指，因此三十日有後一標題。我們不說「鐵路暢通」，不敢「通車情況良好」，而謂「條條鐵路通北平」，聰明的讀者當然可以意會，我們自問對讀者是很忠實的。我們辦報，僅有這點可以自信，也常引以自慰。貴刊記者所述剿總派員訪問一節，想係傳聞之誤。

這封信希望能登載在最近一期的「觀察」上面。

北平日報編輯部敬啓　一月二十三日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報掛號：五九〇〇二七
訂閱辦法
三月(十二期) 平寄：十萬元 掛號13萬五千元 航平十五萬元 航掛18萬五千元
半年(廿四期) 平寄：廿萬元 掛號廿七萬元 航平三十萬元 航掛三十七萬
如郵資漲價，請補繳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平寄)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賓書店
北平崇內大街一一〇號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三卷 第廿三期
卅七年一月卅一日

本期作者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陳夢家：清華大學教授
楊慶堃：華盛頓大學教授
田汝康：倫敦大學研究生
徐中玉：前山東大學教授

關于中國出路的看法

——再答樊弘先生

張東蓀

樊弘先生再不吝賜教，(觀察三卷十八期)本不想再在雜誌上刺刺不休。後來想一想，我亦不妨仿照樊先生的榜樣，只說我自己片面的話，對於樊先生所說的不加辯駁與討論。正想下筆而適值學期結束的考試，爲了許閱考卷一直耽誤到現在。

我在頭一次答復樊先生時曾說，中國不能照抄蘇聯的現成藥方，亦不能照抄現在英國工黨執政的現在藥方。(觀察三卷十六期)當時我的意思絕對沒有以爲中國將來的政治經濟制度可以與任何國完全不同。就「類型」來說，蘇聯是一個類型；英國亦是一個類型。

此外還有一個類型，在樊先生第一篇文章中沒有提起，我却以爲中國反可以吸納在這樣的一個廣汎類型之中。這個類型就是戰後東歐幾個國家所實行的，他們自稱的，新民主主義。當然這幾個國家亦不完全絕對相同。就中，依我看，捷克是最合乎理想的標準。芬蘭有其深厚的根底。波蘭亦決不如外間所傳的那樣偏倚。南斯拉夫的情形究竟如何，決不能如美國一方面的反共宣傳而卽加以斷定。

這只是講類型，並不是說把本國的國情完全抹煞。恕我用一個不切的比喻。亞里斯多德的邏輯講到定義，以爲類加差德。如云人是有理性的動物。動物卽是類；理性是差德。人屬於動物一類，但他有理性，這是其特別的地方。以此比喻來說，中國就廣汎方面來說是可歸入於這樣的類型，卽屬於這樣的一類。但就其特別的地方來說，不能不有其差德。我對於梁漱溟先生同情的地方亦只在於此。他的全部議論可以接受，亦可以不接受，但他提出這一點是可以感激的。就我的個人看法，我和他不相同的地方很多，不過在此不願討論，免生枝節。

再說一說東歐式的民主與蘇聯的不同點。第一在政治上是不僅有一個黨(如蘇聯)，而是多黨並存。只是因聯合而執行一個統一的政綱。第二在經濟上是容納混合的方式。有些是私人資本；有些是國家資本；有些是合作社經營。至於土地則實行合理的再分配。我以爲如果把這幾點當作原則，這都是中國今後所當取法的。尤其我所贊成的是學術自由純採西洋文化的傳統的自由空氣。

以上所說只限於講一個國家的內政。至於其國際關係並不必併爲一談。人人都知道內政與外交在現世界是分不開的。不過凡一個獨立國家總是內政決定外交，不能是外交決定內政。故我們只能先談內政。

至於談到國際，我以爲今天全世界於戰後反陷於紛亂，其原因都在於美國對外的錯誤政策。我們可以說美國的對外政策是使全世界不安的唯一原因。今日要使全世界得到和平與繁榮必須在美蘇以外，由美蘇共同承認有一個中間地帶。這個中間地帶內當然有許多的國家。但有一個條件：卽在這個地帶中的國家，其政治經濟制度由美蘇看來，都不感到威脅。東歐式的民主國家，在蘇聯不感威脅，已不成問題。問題只在美國。美國如果認爲這樣的制度都不容許其存在，而想用種種方法破壞之，則美國如何能不被人視爲帝國主義呢！所以今天解鈴繫鈴，完全在於美國。美國如能翻然覺悟，承認有一個

中間地帶的必要，以作緩衝，則在中間地帶的國家們亦只有是這樣新民主主義制度的。總之，今後世界和平的關鍵即在於這樣類型的國家能否在美蘇兩端的中間存在與繁榮起來。不論美蘇，那一個國能讓這種國家自強起來，他便有前途。否則即是戰爭的製造者。最近英蘇特訂商約，這是一件可注意的事：即商務關係與政治不混淆在一起。這事可給美國以教訓：即美國不必害怕這些非資本主義的國家不和他通商。美國的貨物如不是傾銷，而仍為別國所需要時，依然可以出口，或大量出口。美國因此即不必害怕將來會迫得非拋棄資本主義不可。誠如斯太林所說，資本主義的國家與社會主義的國家可以並存，且可通有無。只須資本主義國家的輸出品生產變一變種類。當然在私人資本主義的國家中，這樣做去是會使有些資本家吃虧。不過這樣的吃虧當不致於根本把資本主義逼得倒塌。資本主義的國家本有週期性的經濟恐慌與週轉不靈。倘使這些資本家中能有些有遠見的把他的工廠改變一下，其出產品改為別的國家（即社會主義的國家）所需要的東西，則資本主義必不會從根本上顛覆。所以我認為美國如果是為了維護他的資本主義，怕蘇聯的緣故，而向這些中間地帶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壓迫，正乃是自討見鬼。殊不知只要這些國家能站得住，他的資本主義反可不倒。我相信這個很明顯的道理，美國人中必有許多能夠見到。所以拿這個道理向美國人說是可以的。至於有人罵我對美尚存「幻想」我願回答：如果還是幻想，這個幻想與中國前途我看不出有絲毫的惡影響。

正寫至此，忽接「主流」雜誌社送贈我的第十三號，其中有數篇文章是反對我的，我不願一一加以討論；不過其中卻有下列的話：

「我們要終結資本主義集團與共產主義集團間之矛盾與衝突，防止世界騷動與法西斯餘孽之再起……一方面提昇了資本主義集團的落後性，而另一方面亦可消除共產主義集團的偏差性。在精神上承受資本主義的政治民主而揚棄了其落伍的制度與觀念；肯定共產主義的經濟平等原則，而卻否定了其極權與殘暴的思想」。

這話說得很漂亮！但我願意告訴論者：這條路已為東歐的幾個國家走上去了。如果把東歐國家亦認為是共產主義集團，那就只是說來好聽。誠如該雜誌的通信上所說的，「美麗的文字，滿篇的謊言」了。

以上的話，我本不想說，只是因為樊先生逼迫得太緊了。後來我又一想，一個書生來談政治，最好還是態度要斬釘截鐵地光明。固然不要顧忌，卻亦不可投機。此一番話是我個人的固定尺度，超過了這個與否當然要看時局推移，但我個人卻是不會有絲毫變化的。此外我還有一個私願：即如果大家認為這是一條路，大家應得暫時把不同的意見收起來，而齊向此爭取。所謂收起不同的意見並不是不許人家立異，乃是必須出於各個言論家的自願。意見一致在主張上會發生一個力量。倘使有人同意這一點，出而發言，或許比我更為有力，因為我自己覺得似乎在爭民主的言論戰場上應該讓別人佔在第一線了。

三十七年一月二十日

雄聖甘地

費孝通

雄是一時的，聖是永久的；雄是權變，聖是常道；雄是術，聖是理。雄和聖要能相合，使一時的成為永久的，使權變不離常道，使術不悖理，是難能，因而也可貴。不擇手段是雄而背聖，用行舍藏，懷道隱遯是聖而棄雄——歷史上這種例子多得很。雄聖聯不上，使人懷疑現實和理想，政治和道德，總是相排斥的。甘地在人類歷史上是僅有的人物；被認為相排斥，相對立的將在他的一生事業中證明是相合的，相輔的。雄和聖將結合在甘地身上。祇有像甘地這種堅韌的靈魂，凝聚的氣魄，苦鍊的肉體，才能當得起這真理的考驗。這考驗真無情，在他自稱已是「垂死老人」時，還不給他安息的暮年，還要他在這人類文明被雄而忘聖的人物所威脅，道德基礎被凌辱，人格國格被金元所褻瀆的關頭，再度標榜出迷惑了的人羣自救的道路。

他如骸的肢體，他如絲的喉音，還要被歷史借用來警醒這面臨空前災難的世界。他說：「我沒有足夠能力說話或行動的日子已不遠了，」但是他繼續說，「在上帝的手裏，就是死，我也不怕。」——「上帝使余開始絕食，故唯有上帝能使余終止絕食。」

他這次絕食是由於印巴衝突而引起的。絕食是甘地常用的武器，以非暴力抵抗暴力的武器。可是這次他所要抵抗的對象卻不是外來加於印度的暴力，而

是外力消除後所爆發出來內在的暴力。這使他更痛心，因爲他的仇敵，暴力，並沒有離開他，已進一步遁入印度的魂靈。他的仇敵並不是什麼人，什麼國，而是暴力本身。誰使用暴力就是他的仇敵，但是誰放棄暴力也就是他的朋友。暴力像是魔鬼，附着人體，去打擊人類的文明，甘地並不因這魔鬼所附着的人和他的親疏而改變他的態度；他會自殺，如果這魔鬼附着他自己。

甘地所不肯屈伏的是暴力，他向暴力宣戰。這似乎是矛盾的說法；多少人譏笑甘地，一說起武器，一說到宣戰怎能不包括暴力？向暴力抵抗，向暴力宣戰，自己就得用暴力，也就是對暴力屈服了。非暴力就談不到抵抗和宣戰。——這表面的矛盾也正包含在我們「止戈爲武」的訓詁裏。我們的歷史却沒有證實這種訓詁並非是不可能；這是甘地，在爲這訓詁作見證。

暴力不能以暴力來消滅，這樣做不過是以暴易暴，暴力換一個附着的軀體。戰爭，暴力的衝突，正是暴力滋長的沃土。暴力會傳染，會像瘟疫一樣的蔓延。所以克服暴力決不能是暴力，但是什麼呢？甘地要答覆這難題。

多少人譏笑過甘地的非暴力主義。譏笑他的人認爲不以暴力去回擊暴力，將永遠被暴力所壓制。暴力本身無所謂好壞，當自己能利用它來壓制別人的時候，這是個好工具，如果被人用它來壓制自己的時候，這才是該咒詛的，其實該咒詛的並非暴力，而是爲什麼自己不能有效的使用暴力來壓制別人。好漢要自強，那是承認了人和人的關係祇是力的平衡；不是去取消力，而是自己增加力。

忽略人和人之間有着力的平衡是錯誤的。人從禽獸的水準裏冒出來，但是骨子裏還是充滿着獸性。禽獸的水準，大體說來，弱肉強食是一條原則，存在是力的平衡；但是認爲人和人之間祇有力的關係，也是錯誤的。人在個體肌肉之暴力之上發現了有組織的團體之力。靠這力量人吃了禽獸，不被消滅就被豢養。團體之力在其在外的表現上也可以是暴力的，但是這更強的對外暴力却是從否定了對內暴力裏得來的。否定暴力是道德，是團體間合作的保障，是和平，友愛的基礎。

譏笑甘地的人認爲暴力決不會消滅，那是因爲他們認爲天下一家，人類是一個大團體，全體合作來創造文化是幻想。這種幻想被視作不切實的宗教，即在宗教裏，他們甚至可以說，和平的世界也祇是已失去的伊甸園和身後的天國，不是這個人間的世界。在人間，不會有統一的利益，永久是分着壁壘，分着陣營，也永遠有衝突，解決衝突的方法最後也祇有暴力。和平不過是休戰，友愛不過是假面具。現實是政治，是權變，是玩手段；甘地錯認了現實，相當殘酷的現實。他是個幻想者。幻想者應當做個小說家，至多是個宗教家，但不能是政治家的。

但是甘地却是個實行家，他在兒時就有印度統一的美夢，現在沒有人能否認印度有今天的獨立應當歸功於甘地。他在把理想現實，在依着他的理想改變現實，決沒有停留在幻想的虛無飄渺間。但是他的「政治」却有別於普通的「政治」。他是超出現在所謂政治家所默認的前提。西洋的政治家有着一個至今沒有變的前提：世界上永遠有着主權分立的國家，國和國之間依賴暴力維持平衡。戰爭是一切計算考慮不能少的坐標。他們也談「天下一家」，而實際是「一家天下」。天下一家是指全體人類是一個團體，所謂一個團體就是有一個道德基礎，道德原則適用於一切人，不因所屬團體而加以分別。一家天下是某一團體獨占暴力，統治其他一切團體。

甘地放棄了這前提，他要以同一道德原則來應付一切事變。他反對英國統治印度，他也反對日本統治中國，他更反對印度統治巴拉斯坦，或巴拉斯坦統治印度。他歡迎一切東方民族的解放運動，但是他不相信暴力是解放的手段。他在日本侵略中國時曾發表過一封公開信，這封信也曾引起英國政府對他的懷疑。他在原則上同意日本要趕走西洋在東方的統治，但是他指責日本，用暴力來做這事，結果將是以暴易暴。他反對印度參戰，但也反對印度利用日本來趕走英國。他這種被認爲不切實際的政策，我相信到現在也許可以使一般人瞭解了。

他一直在警告人類，暴力會腐蝕人性。戰勝國家靠了他所使用的暴力獲得了勝利，但是會喪失他的靈魂。我想目前的美國正是一個最好的例子。爲了自由，爲了民主，他培植了暴力，希特勒是死了，但是希特勒的鬼却戰勝了美國。在過去幾年中，美國人民自己喪失了言論和思想的自由，喪失了罷工的自由；美國的傳統民主精神在戰勝納粹之後會遭到內在的腐蝕，在事前很少人會相信，但是甘地却早預言了暴力的陰險。手裏握有暴力的人，面目是相同，不論出身是什麼。

甘地的任務是在建立一個大同的天下；除非我們認爲這是不好的或是不必的，這如果是人類的目標，努力的方向不能是秦始皇式的兼併，不是拿破崙式的征服，這些在歷史上證明是無效的；這裏甘地提出了一種新的政治，不是暴力的統一，而是道德的統一。

譏笑甘地的人忘記了人類的歷史。歐洲曾經有過兩度的統一，一是羅馬帝國的統一，一是基督教的統一。前者是暴力的統一，後者是道德的統一。在馬

利用出生的有機人，用爲他建設的武器，維持了羅馬的天下。這並非就是，而是人類羣體生活的原則。暴力的統一是一時的，而道德的統一是永久的。

印度是一個極複雜的羣體組合；宗教，文化，種族把這大陸上的人民割離分碎，成了無數不相瞭解的團體。世界上最嚴格的社會階層是印度的 Caste；世界上最排外的宗教是印度的印回兩教；世界上貧富最懸殊的是印度的「滿哈拉加」和平民。在這充滿着紛爭的大陸上，在過去幾百年來又加上了個曾是最強的大英帝國的統治。這裏甘地勾出了個統一的美夢。印度如果能統一的話，世界的統一決不能是更艱難的事了。暴力會表面上做到了印度的一體，那是英國的統治；但是沒有人比甘地更清楚，在英國統治下的印度從來沒有眞正成爲一個團體，因爲在這紛爭擾亂的局面中，缺乏一個道德的統一。他很堅決的否定以印度社會任何一個團體來代替英國的統治，那是以暴易暴；他拒絕以暴力革命的手段來趕走英國，取得獨立；並不是因爲他認爲以暴力去趕走英國是做不通的，在兩次大戰時，甘地確有充分的機會採取革命手段獲得獨立的。但是他拒絕這種試探，他爲了暴動而屢次絕食過。爲什麼？暴力會腐蝕他道德統一的成就。以暴力來傾覆英國統治是可能的，但是以暴力來建立統一的印度是不可能的。

我相信他的認識是正確的，如果印度統一的障礙祇是英國的統治，這次獨立之後，不應再有印度的衝突了。甘地是瑣當的，他要在根本上下工夫。他去和被視爲污穢的賤民相接觸，爲的是要在社會階層的鴻溝上架一道橋樑，逐漸把鴻溝塡平，他調解印回的歧異，他淡食單衣和貧民同甘苦。他在這許多阻礙統一的界線上跨過去，象徵了印度的眞正一統。沒有仇恨！沒有成見，他在建立道德的基礎。

雄聖甘地——這一個億萬人所信賴的道德標準，不但瞭解人間道德的力量，而且是明白怎樣去應用道德力量去實現理想的人。

六天的絕食終於消弭了印度的內戰。我們帶着羨慕而又有一點嫉妬的心情，慶賀印度人民逃過了一個刼難，更慶賀印度能有這一個萬民的領袖；寄言印度的人民，善於愛護這雄聖兼有的甘地，不但爲了印度，更爲了這面臨毀滅的世界，愛護他；也就是愛護一個爲人類建立道德基礎的功臣。願他的聲音超出國界，我們全世界的人民，不願在暴力中毀滅的億萬生靈，需要他。我們慚愧，同是東方的文明古國，我們竟這樣不肖，辱沒我們祖先的光榮，在使用西方的暴力殘殺自己的同胞。東方！這和平的名詞，這會拯救過西方文明的力量，現在蒙受了自己給自己的恥辱。在惶恐中，我們祇有把眼睛望着我們鄰居，背着東方的傳統使命的雄聖甘地。

一月二十二日於清華勝因院

論習文史

陳夢家

大約四五年前，當我尚在昆明西南聯大的時候，常常與朋友談起的一件事，是抗戰勝利後文史科學的研究，必有更新與大發展的可能。當時的想法，以爲對日戰事勝利後，國家漸漸回復常態，國人受此次大戰慘痛的經驗，必然更能想到樹立現代國家的百年大計，在理工農醫等實用學科以外，文史的研究，對于維持過去文化與發展未來事業的重要。那時候的大學，不但文史少人問津，即純粹科學如物理算學，其學生人數與投入工科與經濟系的相比，也是懸殊太甚。此種畸形的現象，在長距離中看來，實是極不合理的。現在試看戰後的諸種情形，可以說全與當時的想望相違，而文史研究的重要性，仍不爲人所注意。我寫此短文，希望有志此學的青年考慮一下這個問題。

我在外時，常遇到外國友人問及中國政治何以如此糟的原因及智識份子對此應該負何責任。我的回答是，民元以來的中國政府與其以前朝代絕不相同處在于良好的智識份子冤避政府職務，而治理地方的人皆不經考選制度而來。因無考選的制度，故官吏無需學問。有學問的人，除非名利權勢之心甚切，決不屑于入政府。此因政府在三種人手中，一曰軍閥，一曰黨徒，一曰無聊政客。此三種人，並非說全是目不識丁。行伍出身的軍人，亦往往想讀書，或告訴人他有二十四史某某叢書等。政客等等亦念佛，亦作舊詩。黨徒等亦有講中國舊道德，以及六藝教育，古代歷史等。後者的人並不知古代六藝是什麼，所謂六藝是否周代眞正實現的制度；他們也可以隨意引易經引論語來證成他們的理論。其實他們與中國學問有什麼關係。試想管理國家是何等的大事，負此大任者應如何探過去艱難的蹤跡知道國家締造之不易，應如何眼觀八方知道立國于現

在的種種應付之道，應如何爲未來百年千年後的子孫打算。此種人至少應有文史的智識，藉此知所以爲政，藉此知所以修身成一良好的公僕。我們不必細論中國何以精，何以亂，何以貪汚與目無綱紀至此。我們只問爲何這般人在國難時發國難財，在勝利後發勝利財，在國家危急時只想自己，不想國家。簡單言之，此等人全無對自己國家菁華所在的文史稍稍留心，從不想到這個國家有什麼値得愛之處，從沒有想做一個老實人可以留名于歷史，貢獻他們能力所及于國家。此等人無暇思念及此，或根本不能。

我並非提倡讀中國舊書即能救國。我們在科學上必需追步西方，是毫無疑義的。我只說凡爲中國人，必須對他自己的歷史文化有所了解，必須由研究此等文化而發生眞正愛國之心，而至使其人有理想懷抱而不作惡敗壞國家。凡眞正受中國歷史文化薰陶的現代人，決不會說「中國樣樣好，樣樣有」，或「古代比現代好」；也決不會以國家爲沒有法子，去信佛或讀莊子，或作無聊的舊詩詞自以爲放達或典雅。這種人也不是消極的好人，諸事不管，有飯吃飯，有書讀書，閉口無言，或言而不行。他們在太平時作好百姓，在危急時仗義直言，臨難不易其初衷。他們可以埋沒一世無聞，亦可以作英雄豪傑的大事。然而，現代的英雄豪傑與古代的究竟不同，他們不能是單個的殺身成仁的志士或獨善其身的賢者，無大補于當世而僅爲千載以下所追慕所嗟歎。他們必需入世，與志同道合者相結合，爲追隨他的領導，作一番實際的事業以改變現狀，而又非盲目的革去一切，而是合理用他的事業上承既往，下啓來者。我嘗環顧左右，有多少人是這等人？這等人又如何出現？他們決非憑空出現，也決非一定要在太平盛世時才會有，艱難與困苦的境遇，加之以諳習文史，不斷的修養自己使能抗拒惡勢力有餘而倡導善良與明智的抬頭。

我總以爲國事如此，挽救尚不爲晚。不能徒託空言，必有非常之士才能當非常的大任。果然在未來五年十年之中，我們的青年第一發願作一個好人，第二發願作一個現代人，第三發願作一個中國人。如此中國或者有望。要作中國人，必需知道中國是什麼，若于中國文史毫無涉獵，那只是中國所出的石頭草木。記得一二年前芝加哥開了次中國學生的夏令會，請一美國的中國學教授去講演。此人于講前告訴我他所要說的大意如下。「你們遠道來此，爲的是學習西方的文明，但有一事在你們未來以前必已有了研究的，即是你們自己的歷史文化，在某一方面說是遠勝過我們的，是爲我們所渴求學習的。有了它，你們才能權量輕重，知道你們在此最應該學取的，以及如何將它和固有文化配合起來，庶幾乎不像我們現在的情況。你們雖求學于此，但同時也有一種責任來答覆所遇到的美國人對你們的問題。他們希望知道中國。所以我希望你們不論所習何科，皆都已具備上述的資格來作交換文化的使者」云云。此人所說的，以及未說的含意，皆極顯然。我對于他之譏刺中國留學生的忘本逐末，實是非常贊同的。在外國，我們希望他不但作一個好學生，而且是中國學生，在國內，我們他希望他不但作一個好的中國學生，而且是現代的。無論如何，我盼望他們時時刻刻不要忘記多多學習中國的文史。

三十六年十二月清華園

美國和平中的火藥味（華盛頓通信）

楊慶堃

一　謠言和心境

新年前後，美國北部各州風雪特別重，許多人怕汽車的水箱會冰裂，於是到汽油站去買防凍液，但多年半是找了幾十家汽油站沒有一家找得到。我聽見一所油站的管理員對顧客說：「在平時，總公司對這站每年度發給防凍液約四百二十加侖，但今年祇發了六加侖，貨一到就賣完了，此後再也沒有來貨的消息。我不懂這是什麼道理。全國製造防凍液的工廠，正在日夜開工，出產是超過以前任何一年，爲什麼市面來貨反而這樣短絀？許多同業說『政府正在大量收儲防凍液，以備對俄的不測，因爲萬一美國對俄開起仗來，北極地區將成主要戰場之一，坦克車和一切軍用自動車輛若沒有大量的防凍液，在冰天雪地的北國就走不動。美國軍隊在許多北部高山，不斷的操練雪上行軍，和市上防凍液的短少，是互有關係的。』」

油站職員這席話，除了操演雪戰一節，確會屢見報章之外，其餘是否可靠，不易斷定。然而，這些話總反映出美國人心的動盪。自大戰結束以來，表面上，世界是渡過了兩年多的和平日子，但實際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在心理上和行動上眞正的解除武裝，恢復和平。以世界新霸主自任而與蘇俄對壘的美國

，更是不能例外。

美國去年生產了二千三百一十億元的物資，工商旺盛，工資高漲，失業數字之低爲十八年所僅見。至少在目前，這是經濟大繁榮的黃金景象，但美國朝野人士，却缺少了與經濟繁榮相伴而來的樂觀和輕快心境。他們的口袋裏儘管塞滿着繁榮景象帶來的鈔票，吃得飽，穿得暖，戲院舞場，座無虛席，耶誕前夕紐約報上登載着一萬元一隻的黃金和鑽石交織而成的自來火盒 Automatic lighter。但這豪擲千金的氣概底下，似乎處處藏着『有花堪折直須折』的意味。

紐約百老匯路上的一家夜總會裏，除夕那晚上的舞伴遊人擠到沒有插足的餘地。香煙化成的重霧覆壓下的人羣裏面，有三個青年男子和兩個少女，圍桌漫漫地喝着『高球』酒，談起時局來。三個青年男子都是這回大戰的退伍軍人，其中有一個說，他雖然眞心傾愛了一位小姐，但總不敢提到婚事，因爲自己不知道明年或是後年，就會再給國際局面迫上征途送命。另一個青年也點頭低聲的說，一年前，他的太太要把他的軍衣捐給寒衣救濟運動，但他對太太說：『這幾套軍衣還很完整，不獨不能捐掉了，而且還應及早洗乾淨，燙光滑，好好的藏在箱子裏，將來儘有用得着它的日子。』他們低微的談話聲音，不久就給震耳欲聾的舞樂所淹沒了。

美國人這種心情，可說是美國目前外交內政很自然的反映。在外交方面，去年一年間對俄關係的惡化，是顯明的事實，就是素來政治意識不强的美國人，也總能看得出來。在戰後的世界裏，美俄能否和平地相處？這在去年年頭還是大家猜索的謎語，但是到了給倫敦會議失敗所送走的年尾，雙方斷難妥協的局面，顯已鑄成，在五六年內的將來，縱使是和平，最多也不過是武裝的和平。

已發展起宏大的宣傳力量的生活雜誌，在十二月十五日的一期，發表了『對德新政策』一篇社論，裏面說：『一場舊的戰爭方才了結，一場新的戰爭又已開幕。』在一片『冷仗』聲中的年底，這話絕非美國輿論界裏孤立的呼聲。我們可以再看看政論家 George E. Sokolsky 氏（此公原是上海的白俄，五四運動以後才來美國，現在成了美國右派輿論代表人之一），在今年元旦迎新歲的文章裏說：『在國際上，一九四七年可謂獲得了兩大進展，一是美俄友誼的假面具，從此折穿，二是聯合國機構之虛弱無能，已成公開事實。……美國與蘇俄間哄騙式的甚至汚穢不潔的友誼，從此告終，美政府今後不必再以對俄友誼一類的字眼，去蒙騙人衆。』事實上，去年入秋以來，在美當局對俄的詞令中，就連口頭的友誼字眼也沒有提送對方。

二『軍人的引進』

在美國之內，透露出火藥味和襯托起戰禍重臨的心理的政治措施，隨處可見，其中尤以美國軍人大批干政，意義最爲重大。自從去年的年頭，馬歇爾將軍從中國回美任國務卿以後，軍人在決定政治方向的地位，就日益重要。羅斯福死後就缺少超羣人物的美國政府裏面，馬歇爾可說是美國人民視線最集中的一顆新星。Time 雜誌奉他爲一八四七年的首位名人，稱他做『命運的決定者。』開年後杜魯門總統向國會全體，報告國務，國會在場議員對他的反應，冷若冰霜，但馬歇爾一入國會報告外交政策，共和民主兩黨議員對他的歡呼熱烈，却得未曾有。除了馬氏的例子之外，還有麥帥和艾森豪威兩位大將軍的參政空氣，一部份的政客要擁他們出來競選總統。麥帥的政治空氣，近來雖已沉寂下去，但刻下我們若數三名至四名最有希望的總統候選人，總免不了數到艾將軍。

以往半年來，美國輿論界中提述軍人干政的文字，很有幾篇，左派的實論對於這趨勢，更是强調地指摘。但素以保守穩重著稱的 Harper's 雜誌，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號裏，也登載了『軍人的引進』一文，文章作者又是素以保守穩重著稱的紐約時報軍事評論家包爾德溫(Hanson W. Baldwin)氏。包氏認爲：『美國生活中的軍人勢力，日益膨脹，頗足以危及美國的民主自由。』他列舉一九四七年身膺美國中央政府要職的名單，作爲佐證，這單子包含下面的職務與名字：

德國美軍佔領區總督 Lucius D. Clay 中將
陸軍部副部長 William H. Draper 少將
駐巴拿馬國大使 Frank T. Hines 準將
駐南非洲聯邦大使 Thomas Holcomb 上將
奧國美軍佔領區總督 Geoffrey Keyes 中將
駐比利時大使 Alan G. Kirk 海軍上將
美總統顧問及白宮幹部人員長官 William D. Leahy 海軍上將
日本總督 Douglas Mc Arthur 上將
國務卿 George C Marshall 上將
國務部副部長 Charl:s E. Saltzman 準將
駐蘇俄大使 Walter Bedell 中將

訪華特使魏德邁中將

民用航空局局長Lawrence S. Kuter少將（本年一月委任，故未在包氏名單之內）

這名單所提示的最顯明的意義，是軍人之操握美國外交政策。馬歇爾的權勢地位，不必贅述。現在對杜魯門總統的外交政策影響最大的，是一位海軍上將（Leahy）。決定美國對外關係的樞紐國家是蘇俄，而駐俄大使是位陸軍中將。巴拿馬運河握着太平大西兩洋咽喉，是西半球的軍事要害，而駐巴拿馬國大使是位陸軍準將。戰事結束後，日德奧等國的美軍佔領區的行政管理，照例應屬國務部，但現在都直屬軍人系統。戰後的美國對華政策，牽涉美俄間以至世界和平，而代表美總統訪華以決定對華方針的專使大員，前後兩次都是軍人——馬歇爾和魏德邁。美國和平時期的慣例，是軍部行政首長不用專業軍人，但戰後至今，專業軍人充塞了軍部行政要津。民用航空局這機關，祇有戰時才發生軍事作用，但在名義上已轉入和平的現在，這機關已由軍人去掌管。

而且，上面這名單祇列出主要角色，次要的行政幹部軍人，並不在內。但除此之外，美國還派出了十三個軍事團，散駐南美洲各國，握有軍事和政治大權。這批海陸軍人和軍事組織之參加政治，操縱外交樞紐，自然替美國政治渲染上一層軍治色彩。『軍人干政』一詞，若用於近代的中國，是指軍人靠着槍桿去打入政府，造就私人的政治地位。但在軍隊已經國家化了的美國，是沒有這危險。除了幾個例外的貪汚壞蛋之外，這批軍人都是才識優異，盡忠國家的公僕。但還和保守如包爾德溫氏，也覺得他們之大批參政，有把美國政治鑄成了軍事模型的危險。他們既出身軍藉，所以都素有發號施令，厲行紀律和着重服從的習慣，以及他們軍事生活涵養出來的造事以武力取勝的基本觀念。

三　軍事的措施

美國軍人之大批參政，在美國政治措施上發生重要的作用，這是很自然的結果。下面是幾件年內發生的事例：

海陸軍合組了國防部，海陸空軍副部長共三人，這正副部長四人都可以承總統之命，列席內閣，這一來內閣裏軍人所佔席數比例，就很龐大了。

海陸軍部內關於政策與政治的機關，已和國務部成立了密切聯絡的混合組織。從此，外交和軍事政策，打成一片。

軍事機關對於科學研究，大規模參加，僱用大批成名的科學家，以至資助和指揮學術研究機關的工作。美國學術機關中的物理學及其有關科學的研究和教育方針，現已受到軍事政策的重大影響，而享受不到全部的學術自由。

美國各學校的後備軍官訓練團，大為擴充。和平時期全美普及軍事訓練一案，勢將在本屆國會提出討論，贊助此議的議員，人數甚衆。

海陸空軍改組案，規定以長官一百人，組織參謀首長會，並設總領大元帥，在危急時，給他操握全國命脈的大權。查自俾斯麥以來，參謀本部實際統治了德國，而這參謀首長會的性質和組織，和德國的參謀本部，同出一轍。

美國工業與海陸軍事機關，維持極密切的聯絡。並且，美國經濟權力之集中，極便於軍事的指揮和動員。（一九四七年的美國工業資產，約有一半是落在二百家大公司手裏。一九四一年以後，好些新公司或原有小公司利用戰時市面的需求，大大的擴張業務。樂觀者因此就說，美國的經濟權力已日益從集中而變成分散，他們指出一九四一年以來，新立的和擴充而成的大規模工業組織，不下八百家。其實，新成立和新擴張的大公司之數目衆多，是美國歷史上戰時和戰後所慣見的過渡現象，等到經濟完全恢復常態，這些新興的公司中，會有很多倒盤。縱就目前的過渡時期而論，這新起的八百家祇握有全國工業資產的六分之一，比起最大的二百家握有全國工業資產之半數，二者難以相提並論。）

戰後美政府以廉價大量拍賣剩餘的軍事物資，但許多的軍事物資現已停止拍賣，由政府自己保留，以備不測。

武器的製造，事關國防機要，外間知道的很少，但報章期刊不斷登載關於秘密武器的試驗和製造的傳說。從超聲速的飛機，毒菌戰，以至原子彈的威力和產量的大增，都帶給了美國人高度的刺激。

現在美國的武裝軍人，還有一百五十萬強，其中陸軍人數的衆多，僅在俄國之下，空軍已擴充至三十三萬五千人，海軍無疑問地全球之冠。而且，海陸空軍在今年繼續招兵擴充。

和平以來，美國軍費每年超出一百億元，平均每個美國人每年要負担軍費七十餘元。現在杜魯門總統所提的四百五十億元預算，是美國歷史上和平時期最龐大的。這新預算中，四分之一以上是直接用於軍費，而資助和救濟各國如馬歇爾計劃一類的間接軍事經費，還沒有包括在裏面。

四　幾種揣測

上述的一串事實，在許多美國自由分子看來，很危險，因為它侵剝奪了美國人民的和平與自由。美國立國元勳的傑弗遜，早就警告國人，說和平時代的

政府如果包含着龐大的軍人和龐大的軍事組織，結果會侵害與權否滅自由。從傑弗遜至今，幾代的美國人都很能尊崇這遺教，在和平時期積極的節制常備軍數目，和壓抑軍人力量，歷來認定軍國主義和民主自由，不能兩存。然而目下美國大部份的輿論，對於上述的和平時期的軍人勢力和軍事活動，並無積極的反抗，祇有消極地接受，其間一部分原因，自然是美俄間空氣惡劣，人民總覺得這些現象是一時國防自衛的需要，而不覺得這是美國歷史上和平時期的反常狀態。四方八面的宣傳，叫他們感覺到戰事還在他們的心境裏繼續，德國和日本的投降，祇引進了暫時休戰，而沒有帶來眞正和平。

上述的軍人參政和軍事措施，是不是美國武力對俄的第一聲？美俄大戰假如是無可避的惡運，那末，人類交還惡途的時間，是否近在目前？這套謎語恐怕一時誰也猜不出個究竟。俄國在最近的將來？不願戰和不能戰，大約是公論。另一方面，據熟悉美俄形勢者以至一些和美國當局有深切關係的人物的見解，美俄關係無論為何惡化，在三四年內，兩國開戰的可能性極少。就以往的事例去推測，除非有很大的變故，美國祇是一面作有備無患的行動，一面盡量犧牲金錢和物資，嗾使第三者去抗俄，而不會以主動地位，親手對俄發難。

但這不過是一些揣測。大局的演變怎樣，很難由有關的一方面單獨地去決定，而須由有關的多方面的態度，策略和行動，互相推演而成。這錯綜繁複的多元變局，怕祇有星相家才敢下個再也沒有疑問的斷語。明早醒來是怎個樣子的世界，連杜魯門或史太林也不會預知。芸芸衆生一分子的汽油站管理員和夜總會裏的退伍軍人，直覺上受到火藥味的刺激，祇有跟着本能的指使，去覆述幾句謠言，和囑咐妻子把方才卸下的戎裝，善藏備用而已。

（一月十六日華盛頓）

解放區印象記

——譯自一月廿四日密勒士評論報——

一個聯總工作者

自從四個月以前來到解放區，我的大部分時間，都用在冀縣（冀南）的農耕曳引機的設計上，該地控扼河北平原的往還交通。在那時候，我雖則沒有充分時間去細察當地的情況，但總覺得既經在一箇地方就擱了許久，對於那箇地方多少有些印象。

印入心目中的第一件事，便是那被八路軍所解放而現在由人民解放軍保衛着的廣大的地區。外界一般都以為中國共產黨是宂居於崇山峻嶺，或局處於延安那種荒蕪不毛之地的。但在這兒，在世界大平原之一的河北平原上，一個人可以駕了一輛吉普車，行駛上三天兩天，却還沒有走盡頭。在那樣漫長的平原上，長着豐盛的五穀——數千英方哩的麥子、高粱、稻子、棉花、落花生、甘蔗、洋蕃薯、蔬菜等類。這兒是一大平原，是一豐腴之區，並且是自古以來用武的穀倉。

表面上是一樣的

表面上，這兒和華北其他地區沒有什麼兩樣。同樣的木輪車子在泥路上輾喳推過，同樣的艱苦農人牽着慢騰騰的犂的耕牛在田裏耕作，同樣的骯髒孩子在村裏池邊泥淖中玩着，同樣的土牆茅屋覆蓋着人和家畜，而在牆上却布滿着標語，倘使你不懂得中文，那麼你會把那標語也當作是一樣的。

遊歷者希望革命會改換了鄉村的面目，但往往是失望的。土地改革在稻田裏看不到蹤影。鄉村自治在街鎮上也不顯著。但倘使一個人仔仔細細地觀察一下，那麼他將發見目前的中國，已經不是他從前所知道的中國了。

我居處的地方，絕少兵士，甚至連市鎮上也是如此。在國民黨統治的地區，城門口往往駐守了重兵，平常百姓進進出出，總得經過一番檢問。政府機關左右都駐了兵，地方團隊到處巡邏徘徊。但在共產黨的後方地區，兵士是稀少得很。老百姓自由自在的走路，自由自在的進出城市，自由自在的進出政府機關。偶然在路上也會發現一兩個兵士，那明明是從前線告假回里或公休回家去的。他們往往帶着武器一道走，那也是很新鮮的。在國民黨區城裏，很少看到一個離職的兵士帶着槍的。這兒有些地區是用來練兵的，在公路上，軍隊也時有調動。但作為一箇戰時鄉村看，兵士是異常稀少的。

另一方面，民兵顯然很多，每天清晨，就可以看到他們在莊子裏打穀場上操練着。有時可以看到肩頭吊着槍，頭上圍了一條白毛巾的高大農人，到城市裏去。有時可以看到他們在公路上大隊動員開拔，或在路旁樹蔭裏休息，有時二百人，有時三百人。在當地，所有的人民都武裝起來了。

無用的城牆

武裝了的人民顯然不須要城牆。任何地方的城垣都將被、或已被拆卸。這和華北別些地方的急急重修城垣，或將城垣加高加廣，恰好相反。在東北有些城市，過去是沒有城垣的，今年却急急的圍起一道土垣來了。但是在臨清（Linching）中共區，他們却用城牆來修補河堤。城市的人把千萬塊城磚拿回家去修補被日本人所毀壞的房屋。農忙時期過了以後，同樣的城磚便用來修築公路。在邊區地帶，城牆是各種建設材料的豐富資源。由於城牆剷平了，城市開始和鄉村打成一片，不再是土豪地主們藏積財物

的殘暴。

來到此地第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就是衣着的襤褸。任何地方你看不到有穿得很華貴的人，除非那些剛從天津到這裏的商人。任何地方你也看不見有衣衫襤褸的人，通常你所看見的，都是自紡自織自染的衣着。紗線固然比較粗糙，織工也比較惡劣，印染也不能耐久，但却是很穿得的，同時老百姓所耗的僅是他們的人工。

辛勤的工作

冬天到了，男男女女穿上新棉絮縫製的衣着。整個的夏季和秋季，婦人們就為了此事利用餘暇辛勤地工作着了。我們到處可以看見她們在紡紗，有的在家門首，有的在戶外樹下，孩子們就在她們身邊玩耍。我們也見到她們在織布，在彈棉絮，在縫製衣着。有一時期，婦人們也在為兵士縫製冬季的制服。

今冬這兒的老百姓可不要凍餒了。雖則今春旱災嚴重，但是夏季裏穀物豐收。當地的人都說，這個地區，有好些年沒有像現在這樣廣泛地努力地耕作了。今夏穀物的意外收獲，使種田人儘量的種下麥子。以前從來沒有種過那許多麥子，因為過去即使年成好，豐收了，種田人所得還是有限。大部分都讓地主和政府拿去了。自從共產黨解放了那地區，穀物都歸種田人所有，他們現在祇希望風調雨調了。

過去冀縣在特殊的環境下，有千萬畝荒田，但我在冀南一帶所見到的，除了極少的零星阡陌未墾種外，其他都是熟田。我曾經探問臨清農事實驗場附近約有五畝大小的一片荒地，據場主吳君說，那是一個地主的，他從未墾種過那片地，他所有的田地自己都不能耕種。

種棉競賽

這兒對於老百姓的種植棉花，解放區政府有一個給獎的競賽來鼓勵他們的興趣。那競賽似乎頗見成效。到處都種了棉花。從南宮往南去，差不多一半以上的土地都種的是棉花。

人們也許會猜測像這樣一個化外的地區，商業大概是不振的了。但適得其反，像臨清、威縣、邯鄲、南宮等城市，商業非常繁盛。店鋪裏堆滿着土產。商人和商店的數量，比較日本人佔領該區的時候，要多出一倍以上。農民因為成了土地和穀物的主人翁，在他們的生涯中第一次有自己的錢可花了。商人和小販都有[illegible]不暇[illegible]之感。

在這些城市裏所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乞丐的絕少。我不能說在解放區中一個乞丐也沒有，在武安地方我看到一個衣衫襤褸的老人，在大街上拿着討飯碗。我也曾看到兩三個瞎子手拿銅鑼在鄉鎮街頭，但他們也許是有什麼買賣的，總之，於短短的時期中，很難相信乞丐是絕跡了，但却有這樣的趨勢。娼妓也是同樣的情形。我曾日夜在這區域中最大城市裏的大街小巷閒蕩，却沒有看到一個娼妓。

最奇特的是在解放區中沒有犯罪行為。你可以開車子到一個處所，車子裏滿載着行李，你下車進入屋內，談了三小時話，當你回到車前，那兒有一大羣人圍聚着在看車子，但車子裏的東西不會遺失一件。在冀縣農耕曳引機設計處，我個人有幾箱子的私下東西，散放在屋子裏。房門常是開着，而總門戶也從不下鎖，但在四個月裏，我未嘗遺失半點東西。

為了維持那些農耕曳引機，我們有許多貴重的零件和剩餘部分。我們因為工作繁忙，沒法檢點那些零件，十天半月的野外工作，每天有許多箱零件拿出去，但我們從來沒有遺失過一點半點。

還有一個關於農耕機械化設計的故事，也非常有趣。那些耕作機械工場，由聯總絡續運到中國來的數千百噸的機器，是最貴重值錢的東西。有兩個運到解放區來的工場，內中還包括特殊的部分，是在上海裝箱密封了的。國民黨員是不主張把那些東西送到解放區裏來的，但不知怎樣弄錯了，把那批機件用船裝到滄縣。後來滄縣失陷，那兩個農耕機械工場便成為解總的了。上海聯總機械工場裏的一批人，自以為他們是懂得中國的，便和派到解總來管理機械工場的人員打賭，以為等到派來的人到達目的地，那些機械早已不知去向，被人偷光了，因為像上海許多工場裏的機械，雖則門禁森嚴，却是被偷盜得一乾二淨，所以他們中間打了賭，賭五塊錢的美金。殊不知等到派來的人員抵達臨清，那兩大箱的機械却原封不動，還是他們在上海裝箱寄出時的老樣子。

有些外國遊歷者曾報道那個地方的反美情緒。他們說他們曾受到嘲弄並且遭到打擊，為了他們有白皮膚高鼻樑。但我自己却從未經驗到過。那兒的人對一部分反動的美國人雖不喜歡，對於我却很友善。我曾在生過赤痢以後的一個復元期間，在滄縣病院裏住過些時。每當晴朗的午後，我常在大運河堤岸左右盤桓。國民政府的軍隊那時正衛向城市反攻。頭頂上是戰鬥機向南飛吼，遠處傳來的機槍擊清晰可聞。但是大河兩岸的老百姓見到我去了，總叫我坐下談天，常常有人讓我坐在他所坐的板凳的另一頭。

人民是和善的

任何別的地方我都發見同樣的友情。當我告訴軍士和民兵我是美國人時，他們也會驚奇的，但是不久，他們便和善地和我談話，並且問我許多問題了。聯總的同事們對我說，那是因為我們工作在新解放的地區，共產黨員在那裏還沒有時機煽動老百姓的反美情緒哩。可是當我去到晉冀魯豫邊區首府的山岳地帶時，老百姓的態度也還是同樣的。我是傍晚時分坐在騾車上到達目的地，登時便有一羣孩子圍聚着看我，摸索着我的衣服並且問我下面的問題。

「你們國家是那一個？」「我是美國人。」

「美國人！多稀奇！嘎，這個傢伙是美國人哩！」

街上頓時傳遍了這個消息。許多人都擁擠着來張望，並且問我說：「你對於解放區覺得怎樣？」或是「所有的美國人都是幫助蔣介石的麼？」

邊區政府對待我們很優遇，供給我們的一切費用，並且要想使得我們滿意和快活。不幸的就是不讓我們隨便東跑西走。有些聯總的工作者就覺得受了委屈，因為正在戰爭狀態下，有些地區便不讓你遊歷，也不許攝影。他們憤怒這種個人行動的束縛，並且由於其不說明眞正的理由，使他們格外憤怒了。在中國一般的習慣，假如說那兒的路不好走或是天氣太壞，那便是說不要遊歷者跑到那些地方去。共產黨員比起國民黨員來，固然坦白得多，但是他們還沒有認識西洋人是更愛理智的，只要你能打開天窗說亮話，那麼什麼事情就都能諒解了。

個人的障阻

行動的束縛，雖則絕無僅有，但鑒於戰爭的殘酷，在一般外國人看來，就認為還是人身權的減削，同時是極權主義和官僚傾向的泛濫。這種個人的阻礙，頗影響到外界對解放區的認識。解放區中的每個人民雖說確實把握了眞正的民主，但由於這種個人行動的束縛，使得一般人容易誤解，對於解放區下一個囫圇的斷語。

對於一個新近來自綏遠的曳引機設計人員看來，解總和行總之間，距離太遠了。在國民黨區域，主管人員是至高無上。他的話就是法律。他要怎樣做便怎樣做。（倘使他的下屬不願意，只有想法怠工）。他離開了職位，一切的決策便蕩然無存。沒有人負責做下去。但在解放區便兩

制了。負責的人首領相繼，在一[illegible]的政策之下了村政[illegible]，在重大的事件上，這兒是沒有獨個兒的決策，毋寧是，會議決的。高級會議似乎也不願意壓迫下級會議。他們中間的關係，毋寧說是解釋的和說服的。

沒有獨裁

偶然我和解總的臨清首腦杜老先生談起，爲了曳引機設計的順利進展，那類事情是必須要做到的。「是的，」他會回答我說，「我深信你是對的，但我不能就此下命令去做。我們得討論一過。讓每個人都知道爲什麼必須這樣做的道理。我們必須爲此開個會來說服他們。」這是個迂緩曲折的做法。往往開會也可能開到牛角尖裏去，但在一個任務適當的當口，便祇會有好的結果。老百姓假如不同意這個命令，他們會怠工的，無論是誰來發施號令，都是一樣的。共產黨人，至少是解總方面的共產黨人，都知道怎樣，理論上去說服人民，並且從而獲得老百姓的援助。

至於曳引機設施的本身，民主主義是其基調。幹部和練習生定期會集，來共同討論許多問題，倘使他們高興的話，並且可對主管人員提出批評。練習生決定他們日常的工作表，他們的工作時間和研究時間。他們選舉出他們自己的領袖和分隊長。因爲每一件事須經過大家的批判，並且須忍耐他們的決斷，使得一個外國顧問人員的工作比不嘗格外紛繁，可是同時却也十分有趣。

設計處首腦張君差不多每天要到我的地方來申訴，或報告那些練習生的理想——他們不依照同等機會開車啦；以及那野外工作的時間延長了，使他們沒有研究的時間啦；以及我浪費了氣油啦等等。他們再三的要求我增加講授有關馬達和耕作機器知識的時間。因爲我自己是一個主張格物致知（由經驗累積知識）的人，再加以從聯總的立場上看，我們必須在大地凍冰以前儘其開墾，所以我僅可能拒絕了課室內的講習工作，爲了這件事情，我們中間經常起了劇烈的爭執。到後來我們中間獲得了妥協。我同意每逢天雨便在室內講授。那裏知道從此以後一連天晴，所以對此事我終於獲得了勝利。

當問題轉到戰鬥變的土地如何利用時，每個人都微覷到了。上至縣長，下至貧農，都暢所欲言。那些有牲口和本錢的富農，是把土地分出來給那些能種田的人去種。而在另一面，貧農們傾向在每個村莊分了田共同耕作。關於這個問題，在各村莊裏召集了許多次會議加以討論；村長和區長和三的[illegible]，結果是富農占大多數，他們占了上風；[illegible]

特殊的給養

和我在一起工作的解放區政府人員是忠誠而且刻苦。他們對於自身毫無奢望。但是因爲我是一個外國人，他們認爲要給我特殊的飲食，在最初幾天裏，設計處的幹部和我一塊兒喫好東西。過後他們良心上受到了譴責。有一天早晨，我在進餐時發覺只備下兩客，是給我和翻譯喫的。其餘的人認爲我飲食的標準太奢侈了，和一般當地人民的食物相去太遠了，所以他們自動的在另外一處喫着簡單的食品，而把我放逐於豪侈的孤獨。對于這個隔離，我盡我所能地抗辯了，最後我們獲得了妥協，便是我們大家在一塊兒喫粗糲的東西。結果，冀縣的飲食，對於聯總工作人員，是出名的最粗惡的了。

當去年夏季的旱災時期的最後幾個禮拜，我得到一個機會發見那些人是怎樣地去克服危機。八月裏，冀縣的穀物顯已受到數月不雨的影響。當地的老百姓都惶惶不安了。他們開始挑水到他們田裏去，希望多少能救活一部分穀物。年老婦人和小孩都掙扎在灼熱的田隴上提水灌田。我們有一輛驗水專車，和四輛大的運貨車。還有些空的汽油桶。大家決定把空汽油桶也利用來運水。在一切未完當以前，那主持人早知道了那些人最須要援助，寡婦殘廢生病的人，他們自己不能幫助自己，於是我們便代他們運水。

艱苦的工作者

這兒政府人員的艱苦工作，打動我的欽心不止一次了。有一天我到區公所去找一位余先生，他是冀縣第三區區長。除了書記之外，區公所裏一個人也沒有。所有的人都有事到村莊上去了。我們決定到村子裏便會遇着余先生，我們隨後登上一輛曳引機車去追蹤他。那次眞是大兜圈子，因爲我們所要找的余先生是騎自行車走的，而他却偏偏的在那天須訪問很多人家。每當我們駛抵一村，就有幾十個村童爭着告訴我們余先生到北頭去了，南頭去了，東頭去了，或西頭去了。那些村童和余先生顯然是很熟識的。最後我們在和鄰縣交界的地點終於找到了他。

在我們討論了農耕曳引機事務以後，我問起農民收穫以後究竟繳納多少租稅。余先生的答覆是：每一單位的土地都有標準的產量估計。租稅視實際收穫的比例而徵收。凡是與標準相近的，納稅較[illegible]。但倘使農家的收穫超過了估定的標準，那麼其超過標準的部分便無須納稅。又如倘[illegible]收穫小於他家屬的最低需要，那麼也用不着納稅。

基本需要

拿鄉子舉例來說。倘使每畝收穫少於十六觔，那末農人便無須納稅。再如農家每人的總收穫小於三百觔，也無須納稅。這個政策是邊區土地政策的典型。這政策的決定，是拿每個人的生活基本需要做準繩的。

在某一次鄉村旅行中，我遇着了這典型政策的又一例。我適遇一位冀南銀行的人員跋涉旱災地區來觀察災情。他是來考察當地的情況，藉以決定今年的放款原則——往常的八厘至一分五厘的利息應否收取，或減輕利息甚至無息貸款。這人是實際生活在農村裏，以求得正確可靠的消息。他那銀行是政府的機關，但却沒有一成不變的借貸政策，完全視人民的需要而適應之。

但是這兒不僅一般低級公務員如此的艱苦卓絕，如此的生活簡單，同時努力去理解農民的需要。我曾和兩位同等才幹的解放區政府高級官員共事過。內中的一位是冀魯豫邊區政府民事局局長袁先生，他同時是解總的一位委員。他常年東跑西走，從一地跋涉到另外一地，有時坐車，有時騎馬，有時甚至徒步。他們到各地去探訪民瘼。有一次雨夜，我們一大批人帶着六輛車子被雨阻在臨清縣西數里之遙的泥塗中。雨一下下了十五個鐘頭，途上的泥濘積有三尺深。我們弄得進退維谷，最後是住到一家村店裏的冷炕上過了一宿。就是在這一夜裏，袁先生騎着他的馬漏夜經過我們那個地點，趕到臨清去開一個重要的會議。雨歹以後，他又到別處去了。

像這種人，他們所注意的，並非局限於農業問題的一方面。他們也顧慮到一切運輸和工商業的發展計劃。事實的證明到處都有。我們可以在數天以內看到漫長的一條公路築好了。在邯鄲縣有一個巨大的 motor pool 和運輸倉庫正在修建中。那 motor pool 的工作人員——機師、車家、和政府中人——正在建造他們的寄宿舍。邯鄲公路也正在重修。

黃河堤工設計

爲艱巨的工作，自然是黃河堤工的設計了，但這個却不是我親眼所看見的。可是我見到那些政府人員和老百姓怎樣地拚着命動員，有的人力物力，用來防止黃河洪水泛濫的威脅。在八月裏，河道裏水位高漲了，在幾天以內，

增築了三百幾十里長三尺高的河堤。堤身薄弱的地點爭擊洞了，河彎處都添置防禦。每隔數百碼，設有守望台，派人晝夜守望着。夜裏我們可以看到黃河的轉彎處守望台上的信號燈。水位曾漲到離緊急防堤三寸高的地方，後來慢慢的退了下去。由於共同的努力，大禍總算是防避過了，而黃河依然如故、未曾決口。直等到後來國民政府的軍隊在唐官屯以南深夜偷偷地掘開了河堤，冀中平原遂致一片汪洋，盡成澤國。

人民的爲了自衛和福利而採取行動，在這兒是認爲當然的。但在一個遊歷者看來，總是不勝贊歎的。舉個實例來說　在臨清和解總的人討論到已墾地的無須訓練而施以耕作，以及促使老百姓立刻行動等問題的困難，當使我頭痛；但等到我回到冀縣，那成問題的土地上，已經種下了麥子。當我離開冀縣去臨清會議時，這兒已舉行過村莊會議　種籽也分發了，計劃早已打好，差不多有一萬畝的土地都已耕作好了。老百姓乾脆把所有的牲口，播種器，犧牲以及所有的人力統統放在田隴上。十四個村子的集團在一個下午天便種了五千畝地。說實在話，像這樣的魄力，我相信連他們自己也要贊歎的了。

互助團體，八十至一百家攏集人工、牛馬、耒耜等來共同耕作，這風氣已廣播各處。但在這兒，人民的總動員依然如故。便是連小孩子也得參加社會服務，倘使可能的話。小孩們不僅要上學唸書，還要幫助田裏的接濟，甚至組織了先鋒隊，到公路上去保衛公路，同時捉拿奸細。他們對於那個工作非常認眞。我在前面曾經說起過老百姓可以自由自在走路，自由地出進城市。但是如果遇到孩子們在執行他們的任務時，便有了例外。在那個時候，無論你是誰，都得被阻止下來查看你的通行證。

看到下面的一箇故事，往往使人發笑。一個六尺高的小伙子，插了手槍，攜了公文包，急駛着自行車通過城門：突然後面一個不到三尺高的孩子，追上了那個人，對他說：「你到那裏去？」那個大傢伙粗暴地回過頭來，似乎是說：「與你什麼相干」，但一看到那張懍然不可犯的小臉：他立即微笑了，彷彿有點抱歉似的，對着下面傍立的人看看，彷彿說：「那有什麼辦法呢？」同時伸手到衣服裏去摸出他那通行證。那個孩子展開了通行證，但是他却不認識上面的字，他嚴肅地拿走那通行證，去給路過該處的大人唸給他聽。直到通行證驗過無誤，纔揮手讓來人過去。有時那小小的民兵拿了飾着紅纓的槍。

在中共區域裏，每椿事都由共同的努力和艱辛工作獲致成就。人民的頭腦和筋肉是唯一的資源。照現代的標準講，中國離工業化還遠得很，不過拿解放區作比較，那麼國民黨的統治區便算是工業巨人了，在他們那裏有汽車、汽船、火車和飛機、工廠、鑛藏，以及動力站。通訊巨埠、和城市都有郵信、電報、電話以及無線電相貫通。在解放區，電話線是希世之珍。雖說這兒沒有那些交通利器，但老百姓仍能互通音信。馬車和自行車在大道上往還不絕，新聞紙照常分佈着，郵信照常遞寄，假如有什麼重大事件發生了，每個村民是由播聲筒通知的。

初來解放區的人們，往往會吃驚的，當我來到這兒的第一晚，對於那一陣像臨死的牛鳴和驢子叫喚牝驢的揚聲筒的聲音，就被嚇得一跳。後來問起這事，方纔知道是村子裏的播音人在高屋頂上通報來了一個外國客人。有時我也懷疑這種方式的廣播，聽的人是否清楚究竟是些什麼。我曾問過他們，們他都說他們都聽不清楚。可是有一次這種方式的交通效果便顯了出來。我去到一箇小村落裏，找一位名叫韓大明的，他是晉冀魯豫邊區的第二個勞動英雄。村長告訴我韓大明住在離村半里的一箇小莊上，他於是登到屋頂，手裏拿着揚聲筒，像黃牛叫似的召喚那位韓大明。幾分鐘後，韓便來了。

勞動英雄

這位韓君，是從連年戰禍和革命中露出頭角的。他現在已是四十三歲了。六尺高的個兒，瘦削而堅強。他滔滔敘述年來他和他的村莊怎樣從千災百難裏歷練了出來。他以前曾經有過十畝瘠地。後來日本人來了，接着便是洪水爲患，水災過了又是旱災。農民們把他們所有的牛羊和犁耜都賣了，以支持幾箇月的生活。過後成千成百的死亡了。韓自己却偏偏不肯死。他試着喫那些草根樹皮和莠草的種子，發見內中有的頗滋養。他組織了羣衆專門蒐集那種滋養的植物。活下的人都隨着韓大明要求土地耕作。他們頸項上曳了犁耕田。他們打了柴拿到城裏去賣。他們和日本鬼子開仗。於是接着便是抗戰的勝利，內戰的爆發，和土地改革。現在韓大明有三十畝耕田，和一匹精壯的牛，那匹牛是他在勞動英雄選舉中得到的獎勵品。勞動英雄先由鄰人推舉他，再由區裏推舉他，此後經縣裏和省裏，最後由整個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的勞動英雄會上通過。他現在雖則仍工作生活在他那一小塊土地上，但他已成爲地方的領袖和全體的英雄。

人民的渴望

當我和韓談話時，別的村子裏的人聚了攏來參加了討論。在韓所講到的以外，每個人都增加了一些意見。當話題轉到將來時，他們有的稱述他們希望重行申請耕地，有的說到正在組織中的互助合作，有的說到今冬的收穫，有的說到區團隊和對境的可能性，他們衆口爭發，彷彿火花爆發。

和這些人在一起談話，便不禁感覺到這地方有很大的希望。四千年歷史的累積，他們突然的向前推動了，或許步伐並不一致，或許不依同等的速率。可是今年的生活已勝過去年，明年的計劃已經存在他們心裏了，他們並且想出千種新方法來增加生產，來增加耕地，來共同努力。

這個新氣象是土地改革和大衆生活改善的結果。我未見到什麼羣衆大會。我也沒有時間去仔細研究他們在怎樣地改革，以及蒐集關於土地再分配的各種統計。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些被沒收的土地和財產，的確分給與人民大衆了。土地的重分派是事實，同時是人民所要做的。原來耕那處田地的人即是其所有者。在路上問每個老百姓，他將告訴你「我家得了三畝地，一輛車和三間屋子」，或「我們得了一條牛，五畝地，八斛穀」，或「我得了兩畝地。其餘便折了現錢」。

人民願意鬥爭

在這地區，人民有土地改革作後盾，他們願意爲他們的土地所有權而鬥爭。就在一月裏，我到山裏去，遇着六百個青年在趕路。每人背着被服，還帶了幾隻器皿。他們三三兩兩的走着，有說有笑。他們都是一區裏的志願兵，趕進城去入伍的。他們中間沒有一個穿制服的，也沒有一個武裝的督隊人。三天工夫的動員令，單在該縣便結集了四千個志願兵。許多有因爲體力單薄或性情乖張，和一部份家庭方面分身不開的，都落選了。現在祇有些最精壯的人方能入伍。

這個分明使人想起有些地方的徵兵，是用繩子牽牢着無抵抗的老百姓的頸項，强迫入伍的。（盤新譯）

觀察通信版

（觀察專稿）

關內外的烽火

觀察記者

一年來軍事的演變，使得戰場山東被丟在背後了。津浦路的徐濟段暢通無阻，而且很少破壞，似乎比平津京滬間的交通還安全。看來是個奇蹟，一語道破也非常簡單，那裏已經不是主要的戰場，長期的城鄉分治中，一方需要糧食棉花，一方需要日用品，有這末一條鐵路南北相通，有無互易，兩方都是有好處的。共軍似乎現在不再破壞那條由東輸血的鐵路了，輸血是兩方都需要的。這其中絕沒有什麼「默許」，有的是經濟流通的自然規律。經濟生活是一幅變化無常的網，聯繫着人民的生活，儘管有人力謀自足自給，卻難能「遺世孤立」。天下一家暫且不必談吧，中國是需要統一的，而且必然要統一的。人為的軍事上的割裂，只是一個暫短的變態，經濟生活會迫使中國統一；因此我們用不着過分悲觀，戰爭雖則是個長期的，但是也絕長不到十年二十年。今年的戰爭是向南北兩端發展，山東是被丟在背後了，中原也有被丟在背後的可能，中共在計劃着重建從石門到德州的德石鐵路，現在已經開始培土方舖石子。以往作為副戰場的河北，為了支援東北與維護政府在北方的治權，在戰事向南北兩端發展中，今年春天可能是個相當重要的戰場。華北五省聯帥傅作義將軍適逢其會，我們要看他與聶榮臻李運昌的鬥法了。

當頭棒　下馬威

傅作義上台之後，一般人就料到不是傅作義給聶榮臻一個下馬威，就是聶榮臻給傅作義一個當頭棒，結果是共軍乘國軍部署未定先下了手，這歲尾年頭的河北緊張局面，演變到一月十三日，在淶水發生了一次劇戰。當平綏平津路交通恢復時，戰爭重心轉移於平漢北段，傅作義部自稱以排山倒海的形勢，從涿縣沿鐵路西側追擊共軍——一直到了保定外圍滿城西南的吳村鎮。傅的大兵團南下了，共軍却在退縮到山地以後，悄悄的向北繞來，與潛伏在淶水以南定興以東地區的共軍相呼應，突襲平漢路西側的淶水——並謀攻佔松林，高碑，切斷南下的傅作義部的後路。這一仗是相當激烈的，駐淶水的國軍兩個營，被共軍嚴密包圍猛攻，共軍是專門吃小部隊的，如果進攻一個小地方，一定是以絕對優勢兵力來幹，另一方面截擊伏擊援軍，以達到他百打百準，一吃一光的戰法。駐高碑店的傅作義基本部隊三十五軍軍長魯英麐，在淶水被圍。派他的部下卅二師師長李銘鼎前往馳援。途中卽與共軍阻援的部隊遭遇在北義安莊町村地區，戰鬥還算相當順利，擊潰共軍抵抗時，俘虜五六百人，他們說還有一個營的共軍集體投降。沒有想到，這大批的俘虜成了國軍的最大担負，他們既沒有力量將他們解到後方，又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兵力來監視他們。到莊町村的時候，李師長打算整師回防，將俘虜送回後方，而淶水被圍甚急，傅總司令督軍長又嚴厲的命令他前進解圍，他一度退出莊町村，不得已又進入莊町村，到晚上又是一個大霧天，伸手不見五指，對面不見人，村外有了槍聲，地道裏也爬出了穿着與國軍一樣制服的共軍來。於是近千的俘虜開始騷動了，守衛的士兵不得不用機槍向他們掃射，槍聲大作，俘虜跳起來，搶到彈藥車上的手榴彈，左右前後亂擲一番，這一場血肉橫飛的黑夜混戰，慘烈已到極點，李銘鼎師長一個人丟擲了兩箱子手榴彈後陣亡。他的手下的兩個團長也負了傷，兩個團的官兵各自為戰，向後方轉移，幸而北義安的一個團還守住了陣地沒有動，不然三個團很可能全部壯烈犧牲，使莊町村成了山東的馬頁崗。坐鎮高碑店的魯英麐軍長，與前方部隊當時完全失掉了聯絡，或許他自已想，淶水沒有了，北義安也沒有了，三十五軍是傅總司令的老本錢，這回被他犧牲光了，於是在十四晨部隊沒有集結完，他從容自殺了！他的自戕是剿總發佈的消息。並沒有留下什麼遺囑。軍方說實際上他的部隊僅丟了兩個團，淶水北義安均屹然未動。共軍經過這次劇戰也有氣無力的退却了，淶水解圍，聶榮臻這當頭一棒打擊得傅作義不輕，傅氏痛心他的部屬的傷亡，聽說心情非常的壞。共軍這次傷亡也不小，官方宣稱共軍死傷萬餘人，根據國軍俘獲估計，至少有三個半團。下馬威對着當頭棒的一幕是過去了，這並不是主力大會戰，不過是一個基於「表演性質」，藉作宣傳與序幕的演出。真正的大會戰，兩方還需要再作重大的部署。

范漢傑　打補綻

華北剿匪總部繼續保垣綏署的任務，除了維護華北交通線，保護大城市工礦港口外，還需要負責支援東北，可是他的有限兵力除了應付境內的共軍外，已經沒有餘裕的力量來支援東北。而東北共軍六七兩次攻勢，都是着眼在關內外交通的切斷，使得關內國軍不能向關外增援，而達成他長期圍困大據點軟化國軍的企圖。東北國軍不必說向外開展，就是要想守住心臟瀋陽和其他如吉，長，四，錦等大據點，也非有關內的接濟不可。長城一條歷史上的痕跡，劃分着東北華北兩轄區，共軍是慣於乘隙找縫的，他不放鬆在兩個轄區邊線上的攻擊。東北華北雖然是人盡皆知的唇齒相依，但唇齒之間有個空隙，極容易給共軍以可乘之機。北寧走廊不通這是主要的原因。前一個月，盛傳楚溪春將出任冀熱遼邊區剿匪總司令，最近政府才決定了以范漢傑兵團來打上這個補綻。范兵團的兩軍人已在山東開始北運，卽將登陸葫蘆島，駐紮錦西一帶，指揮部已決定設在長城線的終點榆關。這兩軍人到達以後，北寧路的守衛力量，當可加強，但能否保其暢通不受破壞，恐怕還成問題。至於整個扭轉東北局勢，當然更談不到。范本人有了新任務後又回廣東去了，聽說是他的老母在大埔原籍被匪綁去，勒索美金二十萬元，他不得不回去設法營救。冀熱遼邊區的匪還沒有清剿，冀魯邊境上的匪又不得不使他分心了。將來看他這一張補綻的力量吧，如果打得牢靠，東北可以稍鬆一口氣，華北也可以減去後顧之憂，安心在河北境內的攻剿。

衛立煌　做替身

陳誠總長出主東北行轅，雖然撐過了東北共軍六七兩次攻勢，但東北局勢並沒因為他這一張王牌打出而好轉。共軍繼續關閉着東北門戶，圍困瀋陽。要強好勝的陳總長，在東北積勞上患着胃病，他是不能在那裏長久支持的，而且兵力也感覺到單薄。最近一次瀋陽軍事會議前，他曾希望傅作義再出兵，但是傅的防區已經擴大到河北，沒有力量去增援東北，有禮貌能週旋的傅作義，當蔣主席到瀋時，他兵不到人到了，攜帶一些北

衛立煌出長東北剿匪總部與全盤戰略的新部署

褚光明

（觀察南京通信）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出乎各方意料。衛回國之初，適值豫境戰事吃緊，即傳中原將設指揮機構，由衛任指揮官，統一指揮河南軍事。其後又傳衛將繼主皖政。兩事皆未實現，不料衛氏終于出綰東北軍符。此次東北剿總之設立及人選之決定，係蔣主席旬前在瀋陽，召集高級將領會議時所決定。人選最初定杜聿明，但未獲各方同意。（京滬報紙有載稱杜隨蔣主席飛瀋，其實杜並未隨行）嗣後由羅卓英建議以衛氏担任。羅為陳誠總長左右手。其建議顯有所本。現在東北將領。大都為衛氏舊屬，所以無人反對。蔣主席返京以後，兩度召見，隨即發表任命。

當蔣主席飛瀋前後，聯合社有一消息，謂國軍將放棄東北。聯合社這一消息，雖非出於突然。早在去年八九月間，魏德邁來華考察完畢後，曾向政府建議：放棄東北，固守華北、安定華中，開發華南。政府對此建議的抉擇如何？外間不得而知。宋子文之出主廣東及西南行轅，與外商接洽大規模投資開發西南諸省，似已採納上項建議。但陳誠總長以抱病之身，堅守東北，則又是對建議的前一部份並未同意。魏德邁的看法，其實也就是美軍駐華顧問團的最高原則。國軍目前在東北所處的戰略地位，確實困難，似此不計代價，全力守衛，未免得不償失。聞顧問團在共軍發動七次攻勢時，曾重提放棄之議。美聯社消息，或係來自該團，甚至或者就是反映該團的意見。誠然，單純從軍事觀點上着眼，東北戰略，值得從新考慮，但政府對東北的看法，不能僅僅從軍事上着眼，而是從多方面着眼。因而東北是在所必爭，不能放棄。不管情勢如何艱難，也不得不以全力確保東北。

既然國軍必須確保東北，而今天東北的情勢，談攻是不可能。祇有守。所以衛立煌的任務，不會超越這一現實。

一年多來的戰事，使政府覺察到，東北戰局的關鍵，不在東北境內，而在華北。平瀋綫的通達與否，是全部戰事的重心。要確保東北，必須先確保平瀋綫。要確保平瀋綫，必須先改善華北局面。單單以重兵周旋於東北，增援與接濟均非易事。結果吃力而不討好。針對這一現實，全盤戰略有徹底更張的必要。東北設立剿總，僅僅是新戰略的一部份，最近恐將另設遼熱冀邊區司令部，以精銳機動的范漢傑兵團担任打通並確保平瀋綫，調整華北的戰略。

根據最近的統計數字，共軍有一百十四萬四千人，包括其野戰軍與軍區部隊。民兵不計。國軍陸海空軍總兵員達四百萬，陸軍已整編者有七十五個師（由舊制二百二十師改編而成。）未整編者約七十個師。數字上比例，約為四比一。國軍在數目上仍佔優勢，但須要用一大部份分散駐防於廣大的後方。共軍祇有前方，沒有後方。祇攻不守，事實上是寓守於攻。全部軍力均投之戰鬥中，此外又有民力的協助。國軍既須守又須攻，往往陷於被動。實際戰鬥兵力的比例數字，並不能保持四對一的優勢。

衛立煌的新任命發表後，四五天來，忙碌易常，並參加國防當局擬訂的新戰略。新戰略的內容，綜合各方面的消息和就現勢予以判斷，大致如下：

以靜制動——將大江以北，黃河以南，劃分為十六至十八個綏靖區，加强民衆組訓，協助國軍，軍政配合，防範並堵擊共軍，以逸待勢，不使流竄入境。

平土產小白梨、柿子、六必居的鹹菜，去慰問陳氏。從那次會中央定的要范漢傑兵團來打補綻。可是陳總長的胃病是不能在那裏長久支持的，蔣主席回京後，又決定了做華北體制，發衛立煌出任東北行轅副主任東北剿匪副總司令，算是一個陳誠的替身，以便陳氏養病。這件事情和陳衛兩氏在滇西交替時非常相似，像是偶合又像是重演，這眞是抗戰時期遠征易帥的「東北版」。現在東北的部隊新一軍，新六軍，五十三軍都是那時候的遠征部隊。那是抗戰最艱苦的階段，現在又是內戰最艱苦的階段。

冬去春來前可能有大打

在東北冰融港開之前，共軍對圍困瀋陽的冰雪攻勢是不會停止的，而且很可能在東北開港范兵團立腳未定以前還有大打。現在衛立煌已飛瀋就職，去接迎共軍的新攻勢。這個任務是相當艱鉅的。他僅有的把握是說，那裏有他不少的舊日的僚屬。他的黑短髭與肥濶的面龐，還是戍守中條，遠征緬甸時的風度，但是面對着東北這個艱鉅的責任，沉默不願對記者多發一言。他不僅是抗戰名將，也是剿匪名將，在抗戰前與劉經扶打下豫鄂皖邊區的大別山，進入金家寨，設立了紀功的立煌縣。但是這次出任東北重任，去保衛東北的心臟瀋陽，瀋陽是否也會有一天改為立煌市呢？現在還難以知道。

衛氏曾堅決表示政府絕不放棄東北，就是吉長也不能放棄。關於東北剿總的人事和未來的計劃，他說都還沒有決定，一切須到那裏與陳總長及各將領決定。他說他還是第一次到東北去，東北的將領在那裏共戰兩年了，一切他們都有經驗，他要以他們大家的意見來決定他的主張做法。傳說衛立煌到東北去，將起用一部分東北軍的將領如萬福麟張作相等。衛氏對此也只是說，一切須到東北去看看實際情形再說。東北實際情形怎樣，看情形衛將軍沒有到東北以前已經明瞭了十分之八九了。說不明瞭恐怕還是遜辭。世界上沒有奇蹟，衛立煌也不會將奇蹟帶到東北去。

中央如果絕不放棄東北，將怎樣守住東北鞏固華北呢？目前的辦法也不過是以范漢傑在長城線上打個補綻，掩護北寧路交通，支持東北，用衛立煌替回那一張王牌陳誠去養病，要傅作義專心致力安定華北，間接支援東北，靜待冰消港開，再籌新對策。但我們前邊已經說過在冬去春來以前東北還有大打。而且三月廿九日以前南方戰事的激烈，恐怕不減於北方，今春的激烈戰事在南北兩端，國守握守的各大城市，如果不是經濟崩潰或工潮學潮迫須到不能收拾，共軍還不定付更大的代價去攻堅。不過東北是個例外，因為共軍目前是絕對優勢的。這也是衛將軍心頭上特別沉重的一點。關內外烽火不會因為華北東北兩個剿匪新體制的出現而戢止，相反的，這倒是大打的信號。衛立煌到東北後，是他先給林彪一個下馬威呢？還是林彪先給他一個當頭棒呢？後者的可能性恐怕比前者還要大一些。

元月廿二日

西北局勢報告

觀察特約記者

西北爲什麼還安穩？

（觀察蘭州通信）政府有兩隻放在空中的大風箏，一隻是以平瀋鐵路爲牽線的東北，另一隻是過去以隴海鐵路爲牽線的西北。隴海鐵路不通已久，但以隴海鐵路爲牽線的西北（指甘寧青新四省），比起東北以至中國其他地方還安穩得多。這有好幾個原因：

（一）就中共言，遠在十餘年前他們便在此一地區的東角——隴東，建立了基地，前歲冬季他們向黨內提出的西北區鬥爭綱領中也有以此基地爲根據，南圖平涼，進出蘭州的決定。但隴東的各主要城鎮如慶陽，合水等地，去春已爲國軍攻克，同時自和談之門關閉後，中共的戰略中心轉移向國內主要地區的爭取，不願把武力分散到政略，戰略上不甚重要的西北。

（二）就西北本身言，寧、青兩省多年在馬家控制之下，門禁森嚴，中共的（其他黨派也一樣）政治攻勢，無從滲入，同時甘、寧、青三省均係封建彩色十分濃厚的地區，一般民衆縱不滿意現狀，但在勉強還能把肚子填飽五分的今天，是寧願忍受環境的壓力，而不肯冒失走險的。新疆的政局雖比較不寧，也因爲人民久爲苛政所虐，今日的當局在統治上既略微放寬尺度，也願苟安，而不肯輕易從事變革活動。

去歲一年間，除了隴東，這裏沒有戰亂，在內地所發生的學生運動。這裏簡直沒有受到影響，而全國各地所不克舉行的中等學校會考，寧夏省卻如期完成了。

如果說今天中國的不安是政治腐化，經濟破產，中共叛亂，以及廣大羣衆對於中國舊統治體系的絕望所促成的，則西北在今天還未完全具備這幾種因素，因之像蘭州這也算做中國大城市之一的地方，竟能安安穩穩地度過了民國三十六年，至於西寧、寧夏，甚至在物價上也都無較大的波動。

安穩中的矛盾

西北地區的安穩對政府是有利的，因爲它能給政府以時間來鞏固這安穩，並製造力量幫助安穩其他地區，至少可以緊扣「綏靖」陝西與四川北部。這一點政府早已體認到，但是新疆首先妨礙了政府的步伐。

二十五年夏新疆勉強步上了「和平」的道路，但歷史積因太久，政府與伊方的心理距離無法縮短，到去歲夏天終於分裂。伊、塔、阿三區的特殊化，不但使政府不安，以致對軍事的佈置不能不竭力進行，就是新疆甚至甘肅人民，也惴惴於新局前途的變化。政府對新疆現在陷於矛盾的苦悶中：第一，對伊方之和談恢復顯已屬於絕望，但還不能不伸出試探的手，這隻手能否爲伊方接握，表面上的關鍵在新疆省府能否改組，改組後的人事能否吻合伊方的口味。在目前對麥斯武德主席這一班人，除了爲迎合伊方外，實沒有更易的理由；不但不願更易，還須特別支持。第二，爲了爭取新疆永遠和平，必須在教育與經濟上下工夫，必須集中財力人力，爲推動此兩大工作而前進。但是伊方的威脅，赫然存在，大部份財力遂不得不用在軍事配備上。從內地運兵到新疆要一筆大款子，到新疆後又是一筆大負担，對土著人民也又是一個大刺激。第三、最近幾年來由於政治局面的急遽變化，封建勢力與新興勢力漸漸形成了對壘形式，雖然還不太嚴重。封建勢力對當局比較可靠，但支持他們只能於目前收相對的效能，而不會於打造未來基礎上有何幫助；新興勢力，則不易把握，且彼等在人民中尚未起較大作用。第四、新疆在目前所需要的安定與發展的資金非常浩大，當局只有仰賴於貨幣膨脹一途，現在已發行二千元票面的新幣了，因而物價高漲，直接影響民生。以上這些矛盾是無法解決的。

去年一年間，當局爲加強控制新疆，曾以巨款完成了青新公路。這條公路通過的柴達木盆地，多係無人煙的混沌地帶，必須經常拋出巨款來養護它，否則如任其自然存在，有事時還是不能運用。以現在政府財政上的窘困及人事制度的腐化，我們對此路前途，非常担心。其次政府對泛濫於新疆的貪污濁流，未始沒有決心來清除，但因爲人事制度，公教人員的待遇（觀察三卷十八期讀者投書中「我在犯法中求生」一文便吐露了此中矛盾）及其他種種關係而無法徹底施行。西北民生實業公司迪化經理周崇勳被槍決不久，省府庫房竟發生監守自盜的醜案，這是夠說明今天的新疆貪頑風氣之可怕？

就甘肅講，它是今天西北的中心，負有安定全面的任務。在表面上看，這一省地瘠民貧，似不克有大作爲，但民貧只是老百姓窮，實際上服務於封建勢力與各別私人的財富並不貧乏。甘肅省主席郭寄嶠可以說是一位廉吏，滿想自力更生，但蒂固根深的舊社會體系限制了他的舉措。即以民食一項講，以蘭州市爲例，目前麵粉百市斤已達九十餘萬元，白米一市石達二百三十萬元，價格竟超過京滬。這個畸形現象之發生，私人囤積係主因之一，當局對之，束手無策。

就西北的東部講，去年三月以來，當局出兵隴東，一時曾將各主要據點收復。但不久共軍反攻，環縣復失，合水一役，付出很大的代價纔保下來，到現在隴東還是一個不安寧的地方、而且地方凋敝，須以大量資金來支持它。就河西講，自北塔山事件發生以來，警惕著此一走廊的安全堪虞，去歲九月間酒泉通額濟納旗的公路（酒架線）完成，於控制上略獲方便，同時散在河西各地的新疆省哈薩克流民已大部被資遣返新，於內部治安上減去一種威脅。但河西終係窮苦地方，酒泉鴛鴦池蓄水庫，縱已落成，開發農田，尚需時日，如果駐兵太多，老百姓委實担負不起。就寧夏講，老百姓苦於兵役，一般流亡於內地的省民，對寧夏省政也深感不滿，但中央則以馬鴻逵爲對付陝北共軍的一枚主要棋子，此次榆林解圍，大半是馬部之功，於是寧夏就只好這樣拖下去。其實這

以動制動——每一區內，配備一強大兵團，對於已入境共軍，追來追去，四面圍剿，使無立足及喘息餘地，予以殲滅或追使出境。過境不追，再由鄰區以同樣戰略對付。這樣，共軍的流竄技倆，將無法使用。

東北方面——亦將增設綏靖區，可能爲九個。確保吉長瀋三角地區。守衛方式：不採據點守衛法，而將重兵放置據點兩側。可以稱之爲鉗形守衛。加強地方團隊組織。

此外，關於華中剿總的設立：不過是統一名稱而已，並無新的意義。

一年來的戰事變化，說明了現行的戰爭不如若干人所宣稱的在短期之內可以解決。三十六年內，國軍銳意進攻，進據要邑，企圖迅速結束戰事。然而戰事的變化往往是無情的，不能純粹樂觀。去年國軍祇注意攻，而今天的新部署，已經談到守字。這表示，戰事在今年內，至少是沒有解決的可能的。

當本文寫稿時，衛立煌尚在南京，而東北又傳來新的消息，謂陳總長即將返京，共軍又將發動新的攻勢。美國駐瀋領事適于此時飛美述職，傳美方又有新的建議提出。這一切都表示，戰事最嚴重的地方，目前還是在東北。

廣東不靖·交通癱瘓

陳微子

（觀察廣州通信）廣東治安問題的嚴重，使廣東的舊派軍人有復出的可能。自從宋子文到任之後，深感「盜匪如毛」，對于他的建設計劃大有妨礙，因爲今天廣東的治安問題已使廣東整個的交通陷於窒息的境地。政府也分不清了什麽是「土匪」，什麽是「共匪」，但對於這些不但襲擊地方政府機關，進攻糧食倉庫，佔領據點，而且還遍佈在整條「綫」上的「匪黨」，不能不再費心機。

前些時，宋子文看中了舊軍人在地方上的號召力，企圖敦請舉軍宿將，出來維持治安；有分別使李福林、莫雄、梁鴻楷分區負責的意思。後來因爲李福林要事權獨立，但當局又恐指揮不統一，便又作罷了。

我們就廣東省內的交通阻滯的情形談談。——首先是貼近廣州的中區地帶的道路不寧。南海、番禺、順德、東莞、三水、從化、花縣、寶安等縣的警察局長，曾集中在省警保處開過會。由前警保處李主任祕書宣讀陳處長訓詞，略謂：「中區各縣，爲省市之衛星，如治安不佳，交通梗阻，足以影響全局」。勗勉各與會人員切實整頓治安，維護交通。

這是由於中區各縣的「匪黨」近來截擊水陸各綫交通，使廣州與附近各縣來往困難的結果。每天，打開了報紙，「匪患」滿目，佔了整面的篇幅。不是輪渡被劫，便是汽車被搶。番禺各公路入夜即禁止行車，從化各區提前辦冬防，加設路警，並實行鄉保聯防。東莞至石龍的公路，汽車經常被搶；增城至廣州的長途車，被劫也是數見不鮮的事了。在順德縣境內，行走小沛至水藤的公共車，曾在沙滘西亭地方遇匪；最近在廣州至花縣的公路上「匪徒」竟連劫七貨車；廣（州）從（化）公路上，汽車連續在斧頭嶺地方被騎劫，計自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一月三日，共被劫汽貨車二十餘輛。廣花、廣從、廣新各路商旅裹足，廣州的外圍交通，完全沒有了保障。

北江水道的不靖，可以從行走廣州、清遠綫的合記拖渡在鯉魚沙地方連續被劫四次看出來。來往清遠、西南的飛輪船，不久之前剛被洗劫一空。清遠石角以至界牌，便有「土匪」堂口四、五個，船舶經過，要納足數重的保護費。過了琶江口以上，堂口更多；如盲仔峽、烏石牯、白沙等處，都是「匪類」出沒之地。由曲江押杉木南下至廣州，起碼要經過五十個以上的大大小小的堂口納保護費。

陸路交通方面，就南雄、始興等地來說，「匪軍」勢力雄厚到了不得，幾乎達於全面佔領的地步，交通情形可以想見。翁源、佛岡更在「匪軍」掌握中，縣長也不敢輕易踏出衙門一步。一位新自佛岡來的友人說，佛岡縣山僻環抱，全縣分兩區，但實際行使政權的祗有附城一區而已。交通方面設法維持，連政府人員出門，也唯有化裝便服。不論是公路上，河面上、或羊腸小徑，都分佈了「匪黨」的路哨，旅途上的人是提心吊胆的。

同時，東江惠陽、博羅的交通已陷斷絕狀態。省惠綫的飛滬電輪於十月間駛至大燉附近被截劫，因爲事先接到「土匪」三萬元港幣的打單信，經爲戒備，所以曾發生了激戰，雖然幸告脫險，但死傷士兵搭客二十餘人。河源上游猪頭石，下游木棉牌；惠州上游小嶺，下游熨斗山，甚至廣州附近的仙村，新塘等處，都時常出沒强徒剪徑。

由於迭次被劫，輪渡聯合呼籲過當局增加各河道武裝力量。曾經有過一個時候是在胆戰心驚的狀態下，陷于半休息狀態，各電輪聯合航行。搭客們雖都懼怕異常，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嘆，但總算還有交通來往可言。而近來又接二連三的被騎劫，政府始終未見有辦法來維持，各輪渡便實行停航！因爲太沒有保障了。

比方說，西江各輪渡迭次接了「土匪」的打單信，每次勒索數百

（下接十九頁）

樣拖下去對政府還算好，恐怕事實上有些拖不下去。首先，陝北三邊現在給馬部來一「綏靖」，馬部既已付出若干代價獲得這塊地方，未必能再甘心讓與旁人。其次還有寧夏省府與阿拉善旗的關係，難於調整，中央支持誰呢？阿拉善旗已經是國防前衛，當地土民與外蒙有密切的血統關係，中央必須拉住他們，直接爭取蒙民。中央還沒有這個決心與辦法，掌握封建勢力代表——親王達理扎雅。達理扎雅和寧夏省府則有過去歷史的裂痕與經濟利益、政治權力的衝突。

就青海講，其地方建設，比較可觀，馬步芳本人也比較開明，但青海的政治體系另有一套，中央在這裏祗可作爲，而且現在隴東與新疆東部還依賴青海部隊來支撐，對青海的一切措施中央也就不能不客氣、不聽便。青海省政之嚴肅與政令推行之迅速及監察機構健全，有些像三十三年前的新疆，其實力之外伸，於西北大局已經發生很大作用，馬家軍在東疆與隴東很得到一般人的好評，實際上講騎五軍與整八二師的軍紀與對地方人民的關係確比其他軍隊好，他們能夠如此，目標當然很遠。

西北是中國民族最複雜的地區。不單是新疆，就是與外蒙鄰接的額濟納與阿拉善二旗，現在也依然和滿清時代一樣，一般民衆過着愚昧與窮苦的生活，王公與喇嘛頭們則安富尊榮，以老百姓的汗血供養着少數特權階級。外蒙現在已是蘇聯的附庸，其人民是否得到充分自由，固屬疑問，但他們的生活方式則終究變了！以額濟納和阿拉善述兩旗人民目前的智識水準講，顯然他們不易接受外蒙的宣傳與拉攏，但外蒙的人民生活，對之總不會不發生刺激作用，如果我們不從速改善該二旗的人民生活，逐漸消除在這裏的剝削制度，則終究是危險的。

此外青海的蒙民與甘，青二省的藏民（如玉樹、安、卓尼等番區），受着建封制度的剝削；地方政府的霸權，簡直沒有發展與進步機會。遠在抗戰之前，中央曾注意到這一點，曾對各區作了些文化工作。但西北邊區民族問題之解決，主要在其生活方式之改變與其生產財富之增加。這些族本來不知誰係他們的祖國，欲啓發其愛國心理，必須由國家給與他們實惠。這裏所謂的實惠，不是臨時性的「賞賚」、「賑濟」、「封爵」，而是經濟的扶助，文化的啓迪，尤其是封建剝削制度的廢除。試問在今天，政府能做得到麽？政府所遭遇的困難既深且廣，目前在邊疆能獲得相對的安定已經滿足了，於是只有拉住這些民族中的封建勢力，因爲在今天，封建勢力還足以左右一切（至少在若干地方民族部落中是如此）。然而封建勢力終不能長久維持其存在地位，擴大人民才是未來前途的開闢者與支撐者。政府也許不會不明此點，可是爲事實所限，只止於明白而已。這樣拖延下去，邊區少數民族的內向心理，眞不知到那天才能建立起來。

時間從來是不等待人的，西北今的局勢，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講，尚有可爲之機，亟須早日有所作爲，但矛盾重重，恐時間終會悄悄地溜蹓，那末這隻大風箏，來春風雨中，其命運令我們生活於西北的人豈止担心而已！

（一月十五日）

週末閒欄

「幹部」之累

田汝康

「幹部」這個術語是最近十多年來中國政治演變的中心。要是目 政治局面有什麼問題的話，所謂「幹部」應該負大部分的責任。

「幹部」這個術語是從法文 Cadre 搬過來的，原語是作組織或體系來講。蘇聯在一九三五年曾有過「幹部決定一切」(Cadres decide everything) 的口號。當時認為：爲使黨員能推行黨的政策起見，各基層黨部應該組織成一個靈活的機構，而要使機構能夠靈活運用，主要的更在乎能對各基層負責黨員隨時加以訓練和淘汰。這便是所謂「幹部決定一切」的解釋。這樣的口號自然是一個做事的基本常識問題。其中倒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大道理。不僅說是黨，就是開行莊或是做商號經理同樣也得注意這樣的問題。不過有趣的是所謂「幹部」在中國社會，尤其是在中國官場中，卻代表着另外一番意思。摒除一切政治因素不論，若把所謂「幹部」看成一個社會學的問題來加以研究，我們便可以發現所謂「幹部」在今日的中國，卻變了質，和幹部原來的意思根本毫不相涉。

中國近十多年政治經濟的演變，若同北伐前一般局面比較的話，自然有很大的差別。北伐前軍閥的混亂，可以說是完全等於胡鬧，糊糊塗塗，到底幹些什麼，誰也弄不清楚。北伐以後，一般情形便有不同了。簡單的說，那就是個人事業心的興起。換言之也可以說大家心理中似乎都想做一番事業，至於做一番什麼事業，雖然也同樣有很多人弄不清楚，但做事的方法和步驟卻漸次比較進步多了。這種轉變是大家所熟知的——凡是想做事的人，不管軍政學商，首先得注意到所謂如何「吸收幹部」「培養幹部」的問題，專門名詞叫做「找班底」。這樣態度的由來是無可責備的，因為這都是中國舊典籍中的故事。每當天下大亂，群雄逐鹿的時候，所謂有志之士爭權奪勢的，初步的工夫大致總不外乎散財結士。一旦得人扶助，有雄心抱負的大致早遲終有機會做點事業。至於雄心抱負次一等的，自己雖不想幹什麼大業，但卻也不就因此而自甘寂寞，總也想找個人投奔一下，將來有機會此人一旦成事，自己自然也就等之封侯列相。在過去所謂「立志」差不多就等於登顯個人野心。在個人野心後而能再有什麼悲天憫人之念的自然也有，不過不算太多。而大多數麒麟閣上標名的人物，可以說都是些第一流的個人野心家。「三顧茅廬」「月下追賢」之類故事是中國人家傳戶曉的，用不着在這兒再多舉例子。以個人野心為出發點來「吸收幹部」或是去投效做「幹部」的做事方式自然也不能完全厚非，所可惜的是時代已經遲了。一般人也未嘗不知道時代不同了，但始終對中國歷史上這一套花樣覺得仍戀戀不捨。由於這些過去歷史上的累積作用，所謂「幹部」在中國便變了質。培養幹部的目的自然不外想做一番事業，投效做幹部的目的自然也在扶人成事，自己從中有好處。至於想做什麼事，想扶人成什麼事，似乎大家覺得並不太重要。能考慮到時代是什麼，社會的需要是什麼的恐怕更是鳳毛麟角。

「幹部」究竟應該是什麼，我們暫且不論。不過在今日中國社會裏，所謂「幹部」可以說是從一種互惠共存關係上產生出來的。這種關係，從做幹部的來說，那就是「我扶你成事，你養我吃飯。」反過來，從培養幹部的人來說，那也就是「你扶我做事，我養你吃飯」。在上面我們曾分析過這種關係的一方面，認為所謂「扶你成事或是扶我做事」的心理是因為過去中國歷史上的累積作用。至於這種關係的另一方面，「養我吃飯或是養你吃飯」的由來，則似乎應該歸告於中國經濟環境的問題。(當然其中也照樣有些歷史的累積作用)。

直到目前為止，中國經濟結構仍然建築在農業生產上。農業社會的特徵，概括的說，要以勞力的過份消費，和職業分工的粗放來得最顯著。鄉下人終年勤勞，櫛風沐雨，終局最多能免於凍餒而已。不過種田固然是辛苦，但不種田又有什麼事可幹呢。做技工得要技術，經商得多少要資本。於是一般聰明人不想種田的便得另想出路，而偏偏在中國社會裏早就有過「做官」一行職業。但我們得注意在過去做官也相當不容易，多年窗下苦讀才能應付那一串的考試，而一般考試也還多少有點標準。可是在近代中國社會裏，做官(靠專門技術做公務員不列入)可以說是最輕便最容易進身的一行職業。種田做工得終年的勞作。做醫生做音樂家得化幾十年的工夫去研究練習，因為做這些事業絲毫沒有什麼憑僥倖投機取巧的可能，化一點工夫有一點成就。而今日做官可不然，既不必特別辛勞而又可以豐衣足食；資格既無什麼了不得的限制而一步登天的機會又處處皆有。要是做官有什麼困難的話，那困難僅僅是做幹部的門路而已。一旦門路打通，蒙要人青睞收為幹部。而自己又能小心翼翼善為迎逢，則雖然不一定做幹部的人人都有多大的前途，但吃碗飯總不成問題。做幹部這條門路既然是昇官發財的捷徑，於是便深深激動了社會間僥倖投機取巧的風氣，當最初想收攬幹部的人也許不無標準，不過一旦政治地盤加大，做首長自然無法處處顧到不得不讓幹部再去找幹部，則久而久之，食客三千，人才可謂濟濟，其中便也不乏雞鳴狗盜之徒。幹部之「累」也就從此開始。

在今日官場中，有些字眼聽來實在不雅。例如開口便「我們的班子如何」，閉口便「我們的老闆怎樣」。要是有氣節有血性的人聽到別人用這樣的言辭來形容自己的話，自然要認為是侮辱。而在今日卻竟今有人自己用這樣的字眼來形容自己。則今日幹部政策的變質到什麼程度，由此亦不難想見。

今日所謂「幹部」既然大多是一般做官的專門人才，除此一行便不想另找出路，(實際恐怕亦無法再謀出路。)於是「養我吃飯」的心理便完全形成。而一般收攬幹部的人也認為「養你吃飯」是件當然事體。

因為在收攬幹部的人眼光中看來，這確是件無可奈何的事情。中國向來做事是以人與人間關係為主。甚而時至今日，規章法令的引用，已經叫做「打官腔」，不到有心找人麻煩的時候，無人應用過。一個機關既無法令規章做基礎，則人事的複雜可知。為避免做事的麻煩起見，用自己所熟知的幹部是唯一的補救辦法。但恐怕一旦有事，臨時無法找得幹部。於是有個人事業野心的人便不得不隨時培養些幹部，儲才備用。

由於受這種「不有班底，不能做官」心理的威脅，今日一般有個人事業野心的長官，在局外人看來，真為一般幹部累殼。不僅未嘗得事之先，便得培養幹部。就是一旦得權得勢，安插一般幹部，也就費盡一番苦心。而萬一不幸下台，還得照樣幹部以圖東山再起，若眞是無法再撐下去，那到處介紹轉業，使之暫時弄碗飯吃更是椿苦事。

養幹部的目的在乎能夠弄一部分忠心於自己的人，聽自己指使，最後得以達到發展自己個人野心，成就一番事

業。所以選擇幹部的標準亦以忠實爲第一，換言之也就是吃我的飯的就得聽我的話。在這樣情形之下，自己有理想有見解的人自然够資格做幹部，大致也不願意做幹部。不過這樣的標準在存心想找碗飯吃的人看來，那豈不是件容易事？講理想和見解也許困難，說能力和才幹也許沒有，但是唯唯否否，吹吹拍拍，誰做不到。蓄幹部的人不察覺，認爲忠於自己的人愈多，大致自己成事的希望也愈大。實際上那兒有這回事。幹部之忠於長官，目的在爲了吃飯，所謂「扶你成事」亦可以做到，條件亦看是否與自身利益有沒有好處。蓄幹部的最後眞能做一番事業的自然有，問題是對所謂事業定義如何，而憑良心說，大多數養幹部的是受幹部之累而不自覺，有的或許感覺到這樣的痛苦，但苦於騎虎難下，有苦說不出。

大家知道，今日做長官的一旦得權得勢之後也未嘗不眞能做點與國家民族利益有關的事情。不過做事的計劃還沒有擬好，調解幹部間的糾紛已經煞費苦心，政治地盤一大，幹部之下得更有幹部。做幹部的目的，如上面指出，就不外在長官的權勢中得點好處。不過有時長官的好處並不能遍及全體幹部，也無法遍及全體幹部，那問題的複雜程度自然可以想見。即使長官給幹部的好處，照外人看來，已經算是公平了，但人心不足，長官有個人事業野心，幹部又未嘗沒有個人事業野心，誰不有夢想自己也能教率領自己的幹部也做做長官。而幹部甲有其野心，幹部乙又未嘗不有此野心。照理論大家同是一個集團，彼此不僅應有禮讓，並且還得有犧牲精神。但事實上那簡直不可能，幹部甲可能作此想，但幹部甲的幹部便不一定會有這種精神。所以幹部政策的發展一旦到達了幹部之下有幹部的階段，換言到達做幹部的同時還得照料他自己的幹部吃飯問題的時候，則做長官的便得集中全力來注意幹部間的糾紛問題了。機構既越愈大，問題自然愈多。在最初幹部本來是爲長官的個人事業野心而產生的，而實際上今日做長官的却是因爲幹部的吃飯問題而存在。有時做長官本也想不再幹下來了，但以幹部們的飯碗問題無着落不得不繼續下去。最後弄到長官竟在幹部間的矛盾衝突中求生存，有的甚至於被一般幹部完全包辦變成了傀儡。有的長官即使尚不致完全變成木偶，而實際上亦被一般幹部完全包圍封鎖與整個現實社會脫離了關係，在如此情況之下，做長官的再想有什麼「親賢禮士」之心自然是不可能了。

所以在中國，官愈做大，選擇幹部的機會也愈少。其理由說起來很簡單，因爲在今日中國經濟情形之下，可做的事雖然太多，但不勞苦工作便能豐衣足食的職位却太少。在一般舊幹部看來，長官的好處既已經有限，不添新幹部已感分配不均，那兒還能容再有搶飯碗的人，甚於這種的心理，於是與高級幹部利益發生競爭的人決無法加入集團工作，萬一有機會加入，可能不久亦會被排擠出去。後進想做幹部的僅有機會做幹部的幹部，或是幹部的幹部的幹部。對一般幹部說，這倒也是件公平事，一切機會的分配不以才能爲標準，而以先後資望次序來決定，做是可以算做到輔助弱者不致於被淘汰的地步。在這種情形之下，假若一般幹部還多少有點能力的活、那幹部多少還能對長官個人事業有點幫助。否則在此重重幹部重累之下，做長官的大致已經是精疲力竭，做事當然談不上，最多也祇不過弄到大家幹部都有飯吃，減少些幹部間的衝突糾紛而已。

上面所指出的祇不過是就一個幹部集團中相互關係而言。而在今日中國有個人事業野心的長官自然不祇一個，於是無堅乎整個中國的社會組織在目前局面下，便分裂爲數的大小幹部集團。要是這些集團能發有同目標和理想作爲前導，則今日政治局面，當然不致於如此。而可惜的是大家不祇找不到共同的目標和理想，甚至於連最實際的共同利益都沒有。由於個人事業野心的作祟和中國經濟環境的限制，不僅在各不同集團間存在着敵對的機係，即使就在同一集團中也照樣有摩擦。

十多年來中國政治的演變最多也不過是些不同幹部集團的興衰起落而已，你出我進，走馬燈似的絡繹不絕。一般民衆的心理觀感暫且不變，弄來弄去，恐怕就連各幹部集團的負責人都有點不快意了。但不知一般做幹部的又作如何的看法，因爲有時候飯碗眞成問題的話，大家想來同樣也會把整個問題重新思考一番的。時至今日再希望全中國各大小不同幹部集團中重新回頭談理想討論時代需要，自然太理想恐怕做不到。但幹部之「累」一日不解除，不僅整個政治局面無法進步，恐怕就是一般長官的個人事業都會遭受到嚴重的打擊。

（上接十七頁）萬元；而事實上西江下游獅山對河沙整地方，近來設置「許多各種「匪卡」，大小輪渡經過，都有被搶擊的危險，沒有充足武裝力量的，大部已自行停航了。這樣，東江河道實際已全部停航，西江也部份停航了。雖然由肇慶到廣州比較寧靖，可是西江船舶必須經過珠江三角洲，三角洲的「匪徒」是著名的。自梧州順流而下，計有「土匪」堂口十個左右。

廣州至三埠間的交通，是經常有幾艘龐大的拖渡行走的。四邑是華僑的故鄉，資金雄厚，所以輪渡上的武裝設備比較完善。前些時，由于華僑接續回鄉，頗引起「土匪」的唾涎，信打單也就發現了；更由於日甚一日的交通「警報」頻傳，各輪渡也都在緊張狀態中。在由三埠啓行來穗的時候，也許爲了壯壯膽，示示威風，船上的護航隊照例先向天放了一排火，然後開動的。在目前來說，這條航線比較上是安全一點。

在由四邑幾乎到陽江的那龍，公路是恢復通車了，但「匪徒」却斷續性地，有時來一個突然的洗劫。在南路電白以下一帶，內戰的火正在燃燒，廉江、花縣大有「此路不通」之概。大多數人經電白赴合浦，欽縣等地，是改由海道前往湛江，再由湛江搭輪到合浦的北海登陸，然後再往目的地的，因爲吳川、花縣、廉江一帶治安不堪聞問，旅途安全大成問題了。

從梅菉管理局赴湛江市，經黃陂至高嶺的電船，也是經常被「匪徒」「光顧」的。高嶺到東營的汽車，更是「匪徒」注意的目標了。環繞着湛江市的四週，是人匪不分的地帶，與治安成問題一樣，交通是在癱瘓狀態中，極端缺乏安全感的。

看來廣東的西線都在各種各樣的「匪徒」掌握之中了，城市將被迫近因得不到營養而日漸僵斃的日子。

提高稿費（自十二次調整）

最近物價張得利害，本刊稿費，自二月一日起，作比較跨大一步的調整，每千字致奉國幣十五萬至二十萬元。又：本刊前因房屋遷址，支出鉅大，所以將稿費「文到即奉」的辦法，暫停兩個月。最近本刊經濟，漸已回復正常狀態，關於稿費「文到即奉」的辦法，較原定期限提前半月，自二月十五日起回復實行。

華北讀者公鑒

本刊華北航空版決定出到三卷二十四期爲止。以後華北各地讀者，即請逕向上海本社訂閱。第四卷第一期以後的售價，現在還無從決定。讀者如早日訂閱，當仍照現在的價目計算，訂閱以後，即可不受加價的影響。此啓。

精工與草率

徐中玉

楊愼「丹鉛總錄」里有一段話論到文章的工與神，這樣說：

「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爲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

這是把神與工分成了兩截，神於文者與工於文者是有差等的兩種人物。但又不然，「文非至工，則不可爲神」，則至工與神仍是一囘事，所謂「神非工之所可至」，這「工」乃指普通的，一般的，或非眞實的「工」。所以歸結起來，還當分別淸楚，「神」只是與非眞實的「工」有別，而這一點，却正是過去的文論中含糊說慣了，往往有人會攪不明白。例如「白石道人詩說」中就有這樣的兩節：

「詩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雖多，亦奚爲」！

「意法欲高，句法欲響，只求工於句字，亦末矣。故始於意格，成於句字，句意欲深欲遠，句調欲淸欲古欲和，是爲作者」。

詩應該求工，但不應該「只求工於句字」，應該求的是可以至於「神」的「至工」，不應該求的是「只求工於句字」之間的非眞實的工——僞工。並不是句字之間就不必求工，但若只知在這上面用力，便成了捨本逐末，欲求工而「至工」愈遠。求工的根本之道在那里？白石指點得精透：便得從情意上去「精思」，去力求其「深遠」，一定要再三精思力索而後作，否則，寫得再多，再好看，也不過白費吧了。

這令我聯想到了外國作家的兩段文字，一段是屠格涅夫在他的「春潮」里所說的：

「這是無數的刻苦地寫成的劇作之一，這類劇本乃是許多有學問而無才氣的作家，着意地，却又笨拙地寫成的，用的是一種漂亮語言，却又沒有一點生氣，一點深刻或激起情趣的思想，而在其中，表現着他們所謂的悲劇的鬥爭時，他們產生出一種煩悶，有人特意稱之爲亞細亞的，好像這名稱是含有一種虎列拉似的」。（馬宗融譯文）

另一段是吉辛在他的「四季隨筆」里所說的：

「哥德對於浮士德是用了充分心思的，但是在他的成就中同樣珍貴的青年時代的抒情詩，是儘筆所能寫的速度，歪斜着在紙上寫下來的，因爲他不能停下去將紙扶直，那又怎樣呢？藝術家是天生的，不是養成的，這種可敬的眞理，即使給我自己的眼睛看，我敢寫下來麼？這時代常常聽到對於斯各得有輕視的批評，根據他沒有藝術的良心，他一點不想起風格便草率寫作，他從不在開始以前細想計劃，你當然知道福樓拜一定很不像他這樣作的；在這樣時候，寫下這個眞理，似乎不算多餘吧。我們爲什麼就不聽到，有一位威廉莎士比亞用類似犯罪的粗心，產生他的所謂藝術作品呢？一位名叫西蒙提斯的拙工，對於他的藝術這樣不認眞，在一章書里描寫山柯的斑驢被偸，不久只是因爲忘記，又爲我們寫出山柯騎在斑驢上面，彷彿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一樣，這不是事實麼？一位塞克萊不是在一部極『主觀的』小說最後一頁上，無恥的承認他在一頁上將法希爾須爵爺的母親殺死，在另外一頁上又使他活了麼？這些對藝術犯罪的人還同樣列於世界超越藝術家之林，因爲他們生活，在一種意義上，在一種程度內，爲他們批評家所不解，而且他們的藝術，是生活妙趣的滿意並持久的表現」。（李霽野譯文）

這兩段話，我相信他們所說的都有普遍事實的根據。而可注意的是：他們雖沒有詳細說淸，他們對於問題的了解却是跟楊愼姜白石幾乎完全相同的。這證明着凡對文藝問題能作精密的觀察體驗的，便都有獲得同一認識的可能。

在我們古代的文論里，還有一種「有形病，無形病」的說法，以爲有形病可以醫，無形病則不能醫。所謂「有學問而無才氣」的作品，正亦就患着不能醫的無形病，因爲這種作品在外形上很可能整齊漂亮，無可指摘，你說不出它在語言上邏輯上有什麼缺點；可是你到底發生不出好感，你總只覺得它的沉悶，無趣，沒有味道。反過來，有些「粗心」的，「不認眞」的，在某些點上可認爲「對藝術犯罪」的作品，雖然患着不少的「有形病」，可是你却並不因此就不喜歡它們，你反而從「粗心」中感到了生氣，從「擴野」中感到了一股新鮮的力量，甚至在你入了迷的時候，這「粗心」和「擴野」竟也成了一種難得的美。

可以說，屠格涅夫那段話里所說的正是患着「無形病」，亦就是，它有「工」而無「神」。吉辛那段話里所說的正是患着「有形病」，亦就是，它雖不甚「工」，可是有其「神」。爲什麼呢？

那位劇作家因爲沒有一點深刻或足以激起情趣的思想，所以就陷於無生氣和沉悶之中了，反之，因爲莎士比亞他們有生活，「他們的藝術是生活妙趣的滿意並持久的表現」，所以作品雖然有些瑕疵，却仍能激動一般人的心，列於超越的藝術之林。誠如白石所說，藝術是應該「始於意格」，然後才「成於句字」的，莎士比亞他們在基本上走對了，所以雖在句字之間有點小疵，畢竟仍無害於其「神」，那位劇作家只因爲在基本上已經走錯，所以雖在句字間十分斟酌費力，便只落得仍是白費氣力，慘敗了。原來這位劇作家所到達的不過是「非眞實的工」的境界。所謂「非眞實的工」，倒並非說他不曾眞費過力氣，是說他力氣用在不應當多用的地方，結果成了勞而無功。因爲，他所求得的「工」，原來和文章的眞正的「工妙」並無多大關係。

明白了這種道理，便也可以知道，如果沒有思想的能培養出思想，思想錯誤淺薄的能培養成正確深遠，那麼，所謂無形病實在也不是不可救藥了。思想雖然是無形的，事情却非常明白。同時，有形病雖然無傷大雅，却也不能因此，或因一時的溺嗜，便不去醫，或竟認爲不必醫。情意深遠了，句字常常有毛病，這毛病必然也會影響到情意的本身，影響到整個作品的效果。以質爲主導，然後求其「文質彬彬」，做人如此，作文亦一樣。

明白了這種道理，便也可以知道，一個作家爲什麼從貧賤到了安樂，從掙扎到了成名，他的作品往往會「退步」，「落伍」，「惡化」的原因了。安樂成名之後，他躊躇滿志了，無所追求了，或者追求的不過是一些個人的利祿了，這樣以後，對人對事，他就再不會有什麼深遠熱烈的情意，同時也再不會有什麼「不得已而言」的需要，於是他便擱筆了，即使不擱筆，也便只好寫些應酬文字，或者整齊而無才氣的東西，因爲他的才氣，也早隨着他的貧賤和掙扎，一道成爲過去了。

一月九日